

法國大革命時期英法對於 「世界公民」的認知衝突

汪采燁*

本文旨在探討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公民定義從抽象轉為具備具體權利義務過程中，所產生的身分定義問題，尤其關注法國國家公民權確立的過程中，自視為「世界公民」的旅法英國政治激進人士在「公民」身分認定上與法國官方產生之摩擦和歧見。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政府對於公民權的界定，積極從制度上去定義「公民」與「外人」，然而在這段期間旅法的英國激進人士，自視為「世界公民」，對於公民的解釋依舊是哲學性的解釋，具道德的概念，與法國政府的法定概念不同。1792年底以後，法國立法嚴格界定並敵視「外人」，並從政治立場和國籍上清楚定義「公民權」，導致旅法英國激進人士因為「公民」認知上和法國政府不同，在身分定位上面臨認知衝突。因此，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旅法激進人士的身分困境，主要在於英國激進分子的古典式公民觀和法國的現代公民權內容大相逕庭，也錯將法國共和政府的博愛精神與世界主義一再劃上等號。本文也對於當前幾份關於法國近代公民權變化之研究提出質疑，在公民定義的轉變過程中，即使法國政府法令表現出現代國籍和公民概念，但是實際上社會的變動還未跟上法律的腳步，故此時期的身分認同依舊是具高度流動性及雙重性的價值觀。

關鍵詞：英國、法國、法國大革命、激進分子、公民權、世界公民

*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十八世紀晚期英法發生多起戰爭，不僅國際關係緊繃，各國國家意識也更加抬頭。¹然而，與此同時，英法商貿與人員之間的交流，以及知識分子間的互訪也相當頻繁。即使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許多政治激進分子抱持著啟蒙時代的世界主義理想和對於自由之嚮往，前往法國巴黎。本文從英格蘭中部伯明罕(Birmingham)激進派的羅素一家(the Russells)開始，描述他們因為政治上支持法國大革命而成為「伯明罕暴動」(The Birmingham Riots)的受害者。羅素一家對於 1790 年代英國政治改革的失望，讓他們在 1794 年決定移民美國。羅素在 1794 年 8 月航行至美國的途中被法國海軍所俘虜，成為大革命下的戰俘，4 個月後才被釋放。羅素家人與英國激進派和法國共和黨員互動時留下來的紀錄，表現出對於共和與世界主義的殷切嚮往，以及他們既是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者，亦是法國大革命下的受害者——戰俘——的經驗，進而探討在 1790 年代同樣抱持世界主義理想的英國政治激進人士，如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 1759-1827)和沃

¹ 例如，英國史家柯莉(Linda Colley)曾在研究中指出，十八世紀下半葉英法之間的緊張國際關係和戰爭對於英國國家意識凝聚與增強的重要性。參見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inda Colley, "Britishness and Otherness: An Argument," pp. 309-329. 在十八世紀下半葉以降，1778 至 1783 年、1793 至 1802 年、1803 至 1814 年英法交戰。1778 至 1783 年為美國獨立戰爭，法軍援美，在北美洲上與英國交戰。1793 至 1802 年為法國大革命戰爭，1793 年初英國加入第一次反法聯盟(the First Coalition)，法國於 1793 年 2 月對英宣戰，直到 1801 年 10 月英法簽訂和平協定草案，並於 1802 年 3 月 25 日簽訂亞眠條約(the Treaty of Amiens)。1803 年 5 月戰爭又起，拿破崙戰爭爆發，英國對法國宣戰，直到 1814 年 3 月拿破崙戰敗並退位。法國於同年 5 月與第 6 次反法聯盟(the Sixth Coalition, 英國也在內)簽訂巴黎和約(the Treaty of Paris)。

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等人，在與法國接觸過程中遭遇的困境和問題。自視為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的英國激進分子與外界接觸的過程中，因為不了解法國政府積極從制度面去定義「公民」和「外人」(foreigners)，²旅法英國激進人士因為「公民」認知上和法國政府不同，處境陷入尷尬狀態，甚至遭致人身危險。

許多歷史學者、社會學家和政治理論學者都同意法國大革命期間是現代公民權成型乃至於確立的重要時期，在國民會議(l'Assemblée nationale)和國民公會(la Convention Nationale)的運作下，法國出現具體備有國籍和政治權利的公民權，甚至薩林斯(Peter Sahlins)以「公民權革命」(citizenship revolution)來形容 1760 年代至 1819 年間的公民權發展，也強調法國大革命期間更是快速且絕對性的發展。³然而筆者對於這段時期的研究卻發現，即便公民權概念的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出現清楚的權利和國籍概念，政府對於公民身分界定卻隨著不同時期政策而轉變，對於公民和外人的定義一再更動，故公民權在定義上依舊具有模糊性和變動性，身在其中的人們也未必能夠清楚掌握公民權含意。

² 本文以「外人」表示法國政府法令中對於 foreigners 之定義。Foreigners 含有外地人和外國人兩種解釋，而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法令中對 foreigners 的定義中又包括反革命分子和貴族。所以，若原史料中清楚是指外地人或外國人時，筆者會直接以確切中文名詞表達，若筆者以「外人」表達時，則是指涉法令規定中的 foreigners。

³ 例如 Peter Sahlins, *Unnaturally French: Foreign Citizens in the Old Regime and After*;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Citizenship," pp. 30-49;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John Torpey,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Andreas Fahrmeir, *Citizenship: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Concept*; Cathérine Wihtol de Wende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 in France," pp. 85-94; Michael P. Fitzsimmons,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Invention of Citizenship," pp. 29-41.

再者，薩林斯或托比(John Torpey)的研究著重在「外人」和公民權的制度探討，卻鮮少看到此潮流下自詡為世界公民的外國人的經驗描述，忽略他們在現代公民權形成過程中的身分認同問題。關於這方面的記述頗豐，無論是本文將述及的羅素姊妹的紀錄，和其他英國激進人士，如潘恩、普萊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威廉斯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的著作或書信中，可得知他們對於公民和世界公民之認知，以及此認知與法國當局政策之差異，如是吾人才能真正掌握國家公民權形成時代中社會變化的全貌。

嚮往法國大革命的英國激進人士來到法國，以世界公民身分或態度與法國革命人士互動。1792 年底，法國對於公民權界定益發嚴格，英國激進人士卻認為嚴格公民權的界定是隨著恐怖時期而來的一段「特殊時期」，法國共和政府的本質應該是世界主義的。即使英國激進人士曾遭遇法國政府的不善對待，他們在「公民權革命」的過程中不曾否定「世界公民」概念，大部分人未必認識到公民權的內容確實在轉變的過程中。法國政府方面，1793 至 1795 年，支持法國大革命的英國人，甚至擁有法國公民權的英國人皆可能因政府政策改變或國際戰爭影響而被監禁，但也不乏在法律上名為外敵，卻由於拿捏政策變化得宜而得以遊走於法律管轄之外的旅法激進人士。

因此，英國旅法激進人士的身分困境，主要在於英國激進分子的古典式公民觀和法國的現代公民權內容大相逕庭，也錯將法國共和政府的博愛精神與世界主義一再劃上等號。本文也將對當前關於法國近代公民權變化之幾份研究提出質疑，法國政府法令表現出現代國籍和公民概念，但是實際上社會的變動還未跟上法律的腳步，此時期的身分認同依舊是具高度流動性及雙重性的價值觀。

二、1790 年代英國政治激進分子的政治理念與處境

當前關於十八世紀下半葉身分認同的研究往往不是強調法國大革命時期民族國家和國家意識的形成，就是強調啟蒙思想中世界公民概念的重要性，皆忽略或未深入研究法國大革命時代人民對於身分認同的矛盾性和國籍概念的模糊性，簡化了歐洲從啟蒙運動盛期進入到民族國家興起時期所面對政治和思想轉變問題。在關於公民權的研究上，社會學家如托比和法制史家薩林斯在政策和法令方面以做出完善的研究，然而法律變化不等於社會變化，社會的變化往往複雜且緩慢，上述學者的研究中沒有筆者所好奇的社會現象。⁴而性別研究為主要的作品中，如艾莉斯頓(April Alliston)和克拉瓊(Adriana Craciun)的研究，⁵又過度強調女性沒有政治權，故沒有國家概念，是世界主義者，並過度以性別來區分男女兩性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觀察和政治回應，忽略男女兩性生存在同一時空，同感此時期之政治危機和戰爭威脅。再者，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女性固然沒有參政權，此時期大部分的男性也沒有

⁴ John Torpey,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Peter Sahlin, *Unnaturally French*. 又如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Citizenship," pp. 30-49.

⁵ April Alliston, "Transnational Sympathies, Imaginary Communities," pp. 133-148. Adriana Craciun,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itizens of the World*. 艾莉斯頓認為歐洲和英國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們建立出跨國界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對於女性而言，她們沒有國家，就有如世界公民。克拉瓊也指出，女性文人的世界主義理想與當時無論是保守派的民族主義論述或逐漸強調英國人優越性的激進派男性皆不同，因為英國男性所強調「自由傳統」或「生而自由的英國人」都沒有女性參與的空間或女性角色存在。因此女性的政治理想不同於當時的男性。

投票權和參政權，⁶本文的主要人物多半是異議派人士，傳統上皆沒有政治參與權。因此這類研究在處理十八世紀末激進分子身分認同之困境上，皆有其侷限，也就有必要重新探討 1790 年代英國激進分子的實際遭遇和身分認同上的矛盾現象。

本文的主軸可從英格蘭伯明罕的羅素一家(威廉·羅素 William Russell, 1740-1818; 瑪莎 Martha Russell, 1766-1807; 瑪莉 Mary Russell, 1768-1839; 湯瑪斯 Thomas Russell, 1775-1851)的經歷帶出，⁷他們是在法國大革命時代面對身分問題的歷史人物。羅素一家的激進政治與異議派(唯一神派 Unitarianism)宗教立場導致他們成為 1791 年英國中部「伯明罕暴動」中的被迫害者。⁸1790 年代的伯明罕英國國教派和異議派人士(通常支持法國大革命)之間嫌隙漸增，異議派在地方上遭受敵視。往後伯明罕地區的異議派人士和激進分子紛紛搬離此區，甚至移民海外，羅素一家也決定移民至美國，尋找理想中的自由社會。然而，羅素一家在 1794 年航行至新英格蘭的途中被法國海軍俘虜，成為大革命戰爭中的戰俘，4 個月後才被釋放。

⁶ 詳細數據和說明請參考 H. T. Dickinson, "Popular Politics and Radical Ideas," pp. 98-99. 十八世紀時只有少部分成年男子有投票權和參政權。更明顯的問題是，當時的國會選舉席次分配不均，擁有大量中產階級的新興大城市沒有直接的國會代表，大量已達財富標準的成年男性依舊沒有選舉權，而異議派人士(如潘恩、普斯利[Dr. 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庫伯[Thomas Cooper, 1759-1839]、普萊斯)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和無神論者在傳統上也都沒有參政權和選舉權。然而，沒有正式參與政治的空間，並不等於她／他沒有身為一國國民的自覺，也不表示她／他無法理解自由理念以及政府需要改革的議題，所以若以有無參政權來區分男女兩性在政治論述上的理想性和敘述方式，恐怕曲解歷史事實。

⁷ 威廉·羅素之妻，也就是瑪莎、瑪麗和湯瑪斯之母，已於 1790 年過世。

⁸ 著名的英格蘭神學家、化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普斯利亦是這場暴動中的受害者，普斯利一家於 1794 年 4 月移民至美國。威廉·羅素是普斯利居住在伯明罕時期的好友。

重獲自由後，他們在巴黎停留了 6 個多月，再航行至理想中的新世界——美國，⁹卻又因法美英國際關係的改變，終迫使羅素家人紛紛於十九世紀初航行回英國。他們的特殊經驗提供後人從不同的視角去看待其身分認同問題。

1789 年後法國的政治變革連帶引起英國國內政治和社會騷動。英國激進派人士自稱愛國者(the patriot)，推動國會改革，對抗腐敗的現有體制。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激進分子益發強調契約論，不講英國古憲法(the ancient constitution)精神，主張普世性的天賦人權。法國大革命後的政治潮流將天賦人權、公民權利(civil rights)和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等概念爆炸性的推展，在西歐和英國各地快速傳播開來，也將英國國內改革運動推到更激進的內容和更急迫的步調上。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之後，強調民主自由的改革浪潮逐漸影響到世界各地，正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出，在這兩次「解放性」的經驗中連帶的自由、民主、天賦人權等理念，持續影響現代政治體制的建構。¹⁰改革浪潮也刺激英國國內出現更激進的共和派人士，如潘恩。另一方面，國家意識型態也在戰爭和文宣宣傳中快速強化，1790 年代英國政府在首相小威廉·彼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後文簡稱彼特)領導下，¹¹運用大量文宣操作，煽動人民反法和反激進人士情緒，

⁹ 羅素一家四人在 1795 年 6 月啟程至美國，在康乃迪克州的密德敦(Middletown)落腳。

¹⁰ 此外，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代相繼毀壞神諭、階級制的王朝和專制王權合法性，這些皆和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產生有密切關連，再由文字出版品做連結，讓民族國家的創造和神化不再專屬於社會菁英，而是關係到全民。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¹¹ 小威廉·彼特在 1783 年至 1801 年和 1804 年至 1806 年間擔任英國首相。雖然其父老威廉·彼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1708-1778)也曾於 1766 年

視激進人士為叛國者，鼓勵人民成立保皇組織，以法令限制言論與出版自由，種種政策皆助長敵我意識，而激進人士也在此氛圍下遭受地方暴民迫害，甚至被迫離開英國。¹²

啟蒙史家文丘里(Franco Venturi, 1914-1994)曾謂，啟蒙運動作為一跨國學術運動的重要特色，乃是兼具愛國精神(patriotism)和世界主義。¹³吾人從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激進人士身上也看到相同特色。威廉·羅素不僅是英格蘭地區的殷商，貿易對象廣及北美、北海和歐陸，¹⁴他也一直關心公民政治和宗教自由問題，以及異議教派的天賦人權問題，更以實際出資幫助地方建設，如道路鋪設、建立醫院、成立圖書館。他甚至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資助美方，在 1780 年代資助伯明罕地區的異議派人士上訴撤除《檢覈法與地方公職法》(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支持英國國會改革，也深感各異議派應團結起來，才能成為有效推動政治改革的力量。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威廉響應革命之自由理念，在 1789 年 10 月時成立異議派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Seven Congregations of

至 1768 年擔任英國首相。然本文所指之彼特政府，皆是小威廉·彼特擔任首相時期之英國政府。

¹² 柯莉(Linda Colley)和紐曼(Gerald Newman)論述中強調十八世紀英國國家意識型態增強的過程中，法國這個假想敵——或是實際就是敵人——存在的重要性，參見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inda Colley, "Britishness and Otherness: An Argument," pp. 309-329; Gerald Newman,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e History 1740-1830*.

¹³ Franco Venturi, *Italy and the Enlightenment: Studies in a Cosmopolitan Century*, preface, pp. xix-xx. 亦參考 John Robertson, "The Enlightenment above National Context: Political Economy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and Naples," p. 672.

¹⁴ 伯明罕的羅素家族在十八世紀時從鐵匠開始發展，逐漸在北美擁有礦場和鍛造事業，更擴及紡織和皮製業，至威廉時更合夥船運公司，將自家事業產品出口至瑞典、俄羅斯、西班牙、荷蘭等地。

the Three Denominations of Dissenters)，又在其財政支助下出版與發行關於宗教自由與政治改革之書。這種團結異議派力量的想法在 1790 年至 1791 年擴張到英格蘭中部地區，甚至到倫敦。威廉的行動表現出他有心改革國家社會，也願意贊助與他理念相同的其他社會，兼具愛國精神與世界主義情懷。

值得注意的另一現象，1790 年代英國激進分子的世界主義，多少展現出親法(francophile)態度，支持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後的共和政治理論與自由理想。因此他們的反專制壓迫、推動政治改革的愛國精神也就與普世性(universalism, 此指普世性政治理念，如自由和天賦人權)相結合。但是，當法國大革命日益激進，甚至威脅到英國憲政傳統，1793 年英法宣戰，支持法國大革命即是支持英國的敵人，英國激進人士的愛國精神和普世性在實踐上就有相當大的困難度。當 1790 年代英國如火如荼的區分敵我，強化英國自我與歐陸「他者」——尤其是法國——的對立時，抱持世界主義、普世性政治理念和親法態度之英國激進分子會遭受英國同胞敵視和排擠。1791 年英國各大城市出現反對激進派，高聲支持「教會和國王」(Church and King)的群眾暴動，英格蘭中部伯明罕地區也出現暴動(the Birmingham Riots of 1791)，暴民群起攻擊支持法國大革命者的宅邸。普斯利(Dr. Joseph Priestley)的住家和實驗室於 1791 年 7 月 14 日被燒毀，羅素和其他支持大革命理念者的宅邸亦遭破壞。¹⁵

像威廉·羅素這樣的政治激進人士，不見容於益發強調歷史傳統的 1790 年代英國社會。在英國保守派眼中，啟蒙運動中的自由理念、世界主義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共和思想等概念乃一脈相承，這些理念和英國君主立憲制相違，是錯誤的，具煽動性的，甚至可能是叛國行

¹⁵ 關於 1791 年「伯明罕暴動」的詳細研究，可參考 R. B. Rose, "The Priestley Riots of 1791," pp. 68-88. Martha Russell 也留下對於這次暴動的敘述，請見 Martha Russell, "Martha Russell's Account of the Birmingham Riots of 1791."

為。1792年夏，英國政府展開對於激進分子集會與出版的迫害行動，迫使許多激進分子考慮移民海外。¹⁶1792年後期，凡著書推動國會改革，批評或詆毀英國政府、既有制度和散播革命思想者，以及激進團體的集會皆可能觸犯煽動罪而被審判，至1794年首相彼特主導下，英國國會在5月7日通過暫停人身保護令(the suspension of Habeas Corpus)，並以叛國罪名監禁激進人士。¹⁷1791年「伯明罕暴動」過後威廉致

¹⁶ 1792年5月21日，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r. 1760-1820)簽署一皇家宣言，警告其子民若在英國境內散播「邪惡和煽動性著作」(wicked and seditious writings)會引起國內「騷動與混亂」(tumult and disorder)，故該宣言旨在督促忠臣的英國子民去避免和阻止任何可能造成暴亂和騷動的行動。引自 Robert R. Dozie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the English Loyalis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 潘恩的《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即被列為禁書，潘恩被判煽動罪。在彼特政府的主導下，潘恩的審判於1792年12月開審，潘恩逃至法國。參見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 172.

¹⁷ 關於暫停人身保護令之國會辯論和投票，以及秘密小組(the secret committee)對於具煽動和叛亂可能之激進派團體出版作品，如「倫敦通信協會」(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和「憲法資訊協會」(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審查過程，參見 *An Impartial Report of the Debates on the Suspension of the Habeas Corpus Act*. 1792年11月，里維斯(John Reeves, 1752-1829)在彼特政府幫忙下成立「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以對抗共和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此後英國各地咖啡廳和酒館因為害怕地方政府可能吊銷執照，不歡迎任何和激進分子相關的團體進入，1793年英法開戰後，激進分子被各種英國保守文宣描繪成與法國結盟的叛國者，是人人得譴責的危險分子。關於1790年代英國各地保皇組織(the loyalist association)的運動，請參考 Robert R. Dozie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關於里維斯及其組織，請參考 Michael Duffy, "William Pit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Loyalist Association Movement of 1792," pp. 943-962; Robert R. Dozie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pp. 57-64 和 H. T. Dickinson, "Popular Loyalism in Britain in the 1790s," pp. 503-533.

力為受害者爭取賠償，前去倫敦與彼特會面，但彼特政府對於受害者的賠償和肇事者的審判一再拖延而無下文。¹⁸威廉積極為受害者發聲的行為也就造成其家人在地方上繼續遭受敵視。生活在 1790 年代的英格蘭，普斯利和羅素兩家也逐漸對於英國改革感到無望，認為人民的天賦人權已受到嚴重威脅。在他們看來，唯有法國和美國擁有進步的政治體制，保護所有人的自由和權利，並將「世界公民」的理念落實在人類社會。普斯利決定移民美國，許多英國激進分子也在 1794 年至 1797 年間決定移民至美國，期望在北美落實共和理想。¹⁹普斯利一家於 1794 年 4 月從倫敦出發航向美國紐約，羅素一家也於同年 8 月出發至美國，這一批失望的、被政府和人民聯手迫害的激進分子被迫離開英國，前往他們以為落實了自由與平等信念的世界主義國家。

關於「保護自由及財產協會——以對抗共和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對激進人士的批判，見 *Liberty and Property Preserved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A Collection of Tracts*, 9 vols.

¹⁸ Thomas Russell, "Memoir of the Late William Russell, Esq.," p. 153; R. B. Rose, "The Priestley Riots of 1791," p. 80.

¹⁹ 英國激進派作家皮戈特(Charles Pigott, ?-1794)在其《政治辭典》(*A Political Dictionary*)中，將「移民者」(emigrant)定義為「如同普斯利或庫伯，因為遭受迫害而被迫逃離母國，前往遙遠的土地——可能是美國——去找尋自由。大部分歐洲國家——除了法國之外，仍是實行根深柢固的專制主義。」不難看出，在 1790 年代中期的激進分子眼中，「移民者」的定義就有如今天的「難民」(refugee)，被迫離開母國。Charles Pigott, *A Political Dictionary Explaining the True Meaning of Word*, p. 17. 皮戈特是 1790 年代多產的諷刺作家，1795 年因作品觸犯當年公布之「叛國與煽動罪法案」(*The Treasonable and Seditious Practices Act, 1795*)而被捕入獄，其《政治辭典》在獄中完成，未及出版皮戈特已逝於獄中。《政治辭典》並非客觀的辭典，其用字遣詞充分展現 1790 年代激進分子的政治意識型態和用語，批判英國的保守思想、君主體制和階級社會。

三、英國世界公民觀與法國國家公民權之摩擦

在航行至新英格蘭的途中的第一個星期，羅素一家人所乘的船隻就被法國船艦所俘虜，船上英國人皆成為大革命時的戰犯，雖然美國官員得知後隨即出面交涉，4個月後羅素一家才因為威廉·羅素與美國大使和法國共和黨人的特殊關係而被釋放。²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政府不斷在界定國家(nation-state)和公民資格問題，連帶也定義何謂「外人」。再者，英法兩國已於1793年2月開戰，同年10月9日，法國國民公會宣布，凡是1789年以後才抵達法國境內的英國人，都將成為人質；甚至凡使用英國製品或穿著英國式服飾就有英國人身分之嫌，進而被逮捕。²¹爾後甚至連法國境內的英國激進分子——支持法國大革命且先前被革命黨人視為公民者——也適用於此法令，得不到特殊保護。²²海上也是如此，法國保衛艦將英國或美國船隻皆拘留下來，其船上乘客皆被視為人質。²³羅素家人之所以會成為戰俘，顯然與法國的相關政策的變化有關。法國在1793年後，要求境內無論國內國外人士皆需隨時持有官方發行的護照或相關身分證件。可是，英國人在自己國內一直沒有持護照旅行的習慣。羅素一家人在法國的遭遇，顯示出法國開始採取嚴格的國家公民定義，國民證件可以立即

²⁰ 以下關於羅素家人海外旅行經驗，資料多出自於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以及 Mary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²¹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76, pp. 284-288. 關於1790年代法國如何定義公民和外人，後文將詳細論述。

²²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76, pp. 639-645.

²³ 參見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789-1799*, pp. 200-201, 240-241.

區分敵我。然而對於此種新的國民身分辨識，大部分英國人尚未跟上態勢變化，才會完全沒有相關證件就出發前往美國。可惜在幾份關於威廉的資料中都將這段時期草草帶過，²⁴唯瑪莎和瑪麗在日記中仔細記錄下這 4 個月的遭遇，透露出公民權改變過程中，無論是法國人或英國人對於公民身分界定的不確定性、多重標準和矛盾。

瑪莎和瑪麗受到父親和其友人的影響，支持法國大革命理念。²⁵瑪麗認為，法國舊政權時代「駭人的專制主義」讓法國人民過著「奴隸般的生活」。不過法國「勇敢的捍衛自由人士逐漸將幸福和和平還給人民，美好日子指日可待」。²⁶瑪莎的日記中也幾次記下被法國人對於自由和革命的熱情所感動。²⁷因此，羅素姊妹熟稔且支持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和共和理念。瑪莎的日記中寫道，在 8 月 18 日，她的么弟

²⁴ Thomas Russell, "Memoir of the Late William Russell, Esq.," p. 154. William Russell, *Supplicatory Addresses to the One Everliving and True God, with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by Theophilus Browne*, p. xx.

²⁵ 在英國伯明罕期間，激進思想家普斯利曾教導瑪莎，瑪麗和湯馬斯。往後普斯利在美國時，寫給威廉的書信中曾問及羅素姊妹學習的狀況，稱讚她們的思想。參見 "Dr. Joseph to William Russell," 12 June 1792; "Dr. Joseph Priestley's letter to William Russell," 19 April 1797, in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ed. John Towill Rutt, pp. 189, 376. 又例如，瑪麗曾在日記中寫道，她們仍在英國時，激進政治作家庫伯曾和她們姊妹講述其巴黎見聞，並保證如果她們有機會到歐洲，一定會對巴黎印象甚佳。日記中看來，瑪莎相信庫伯的巴黎見聞。參見 Mary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 71. 庫伯是在 1792 年春天庫伯偕同瓦特 (James Watt Jr., 1769-1848; 發明家瓦特之子) 出訪巴黎 4 個月，期間聯繫了許多法國大革命參與人，並被引薦給羅伯斯比爾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 和其他雅各賓黨員。Albert Good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The English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46.

²⁶ Mary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 62.

²⁷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 34.

湯馬斯告訴她有艘名為「普羅瑟畔」(Proserpine)的法國保衛艦接近她們的船。她當下對於即將看到「好共和黨員」(the good Republicans)感到非常興奮，趕緊梳妝打扮跑上甲板。而後，瑪莎的心情急轉直下。法國官員要求英國乘客出示前往美國之護照，但無人攜帶此證件。該法國船艦扣留了瑪莎等人所搭的英國船隻。於是，支持法國大革命之理念與行動的瑪莎及其家人，成為法國大革命下的戰俘。²⁸羅素一家人和船上的英國人皆被轉拘留在「普羅瑟畔」艦上。雖然這些「好共和黨員」為羅素姊妹帶來「成為法國共和黨的人質」的噩運，但在接下去的日子裡，船上的法國官員屢次向羅素一家保證「會妥善照顧我們，不必為目前的狀況感到擔心或懊惱」。²⁹在這段被拘留的日子中，有別於艦上其他英國人，羅素一家確實是被禮貌地對待。³⁰在羅素姊妹的形容中，法軍艦長和官員時常給予她們一家人特別照顧，她們與這些法國人相處甚好，且透過對於法國人的穿著、言語、餐廳陳設等正面描述，表現出她們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支持和同情。³¹根據瑪莎的紀錄，艦上的法國官員時常邀請她們一家人前去共享晚餐，且態度彬彬有禮。她也表示到，因為這些官員們的文雅態度和關心，讓她的生活漸漸舒適。³²

瑪莎與瑪麗從官員或水手身上看到大革命的痕跡，如他們時常歌唱馬賽曲，餐廳中的政治性裝飾，官員們對於大革命的熱情，與宴席

²⁸ 例如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p.15-16.

²⁹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 17.

³⁰ Mary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p. 9-10.

³¹ 她們所抱怨的是因為被俘虜而無法繼續前去美國，而且必須和其他英國俘虜一起生活在擁擠吵雜骯髒的環境中，參考 Mary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p. 9-11, 41-42. 關於英國激進分子的世界主義概念有無階級概念，筆者將另文討論。

³² See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p. 19-20.

間法國人展現出優雅卻不失開朗的禮儀。³³顯然羅素姊妹的觀點與大部分英國人不同：這個時期大部分英國人將法國人視為洪水猛獸般的敵人，而羅素姊妹卻視法國革命黨人為值得欣賞的朋友，表現出英國激進人士的親法傾向和世界主義。³⁴1793 年秋，法國進入「恐怖統治」(the Reign of Terror)，英國在彼特政府主導下，公眾情緒以負面的角度去呈現法國，法國人被視為嗜殺、邪惡，隨時伺機入侵英國的敵人。身處這個時空背景，羅素姊妹因為接受了父親與其友人的激進政治思想，相信法國大革命理念，使其能夠從正面的、好奇的態度去觀察艦上的法國官員。

據以上所述，從政治理念和世界主義來看，至少在現階段，國籍分野對羅素姊妹來說並不重要，只要支持大革命理念者皆是朋友，是手足同胞。或者是說，國籍雖然讓她們成為俘虜，不過，國籍不是影響她們身分認同的主要因素。法國官員的政治認同也同樣有趣；國與國之間關係緊張，法國開始從法律嚴格界定公民身分，但其人民依舊保留啟蒙時代世界主義式認定身分的方式，情感上還停留在「公民權」模糊的時代。法國官員雖然按照國家政策規定，將英國船隻佔領，船上的英國人成為俘虜，但實際上他們對待這些抱持激進思想的英國人(支持法國大革命者)依舊友善如同胞手足，世界公民理念依然存在。

1794 年 12 月，另一艘英國船隻被法軍俘虜，船上的英國水手也被帶上普羅瑟畔艦。據瑪莎形容，這群「絕望的英國人」請求羅素一

³³ 參見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p. 20-21, 33-35; Mary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p. 9-11.

³⁴ 當然英法上層社會也有既互相欽羨又敵視的文化情結。1789 年之前，法國人的性情屢被英國文人描繪成熱情洋溢、愉快、膚淺、善變、虛假和具奴性。參見 Gerald Newman,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pp. 1-47, 63-84.

家人和其他人拆下支持法國大革命的帽章。³⁵羅素一家人百般「不願在法國領土上向英國暴政(tyranny)低頭」。³⁶最後羅素姊妹不得已而拆下帽章，但她們害怕被英國水手羞辱，幾乎沒有勇氣走上甲板。她們的父親威廉則固執地堅持不拆下其帽章，直到水手們以其性命做威脅，甚至同行者請求威廉不要再穿戴「敵國的象徵服飾」。威廉卻回答到，「英國不再是他的國家，美國與法國交好，且他的政治理念讓他讚賞法國政府」。船上原有的英國人也開始感到不安，擔心威廉一意孤行會為他們帶來麻煩。威廉考慮再三，最後還是摘下他的帽章。³⁷

由此可見，威廉認為，英國政府已經背離了自由理念，屢次拒絕改革，不再是他理想中的家國，因此他不願意臣服於喬治三世統治下的英國。他相信，法國大革命展現了美國政府的共和政治理念。羅素一家人也絕對是世界主義者，因為他們表明其立場，既是美國的朋友，也支持法國大革命。比起同情船上的英國人，他們更能同情與其政治理念相同的法國共和黨人。然而吾人也看到羅素家人不獨鍾祖國的態度，招致旁人懷疑。在西歐社會，如英法，都出現質疑世界公民的聲音，認為他們不是四海為家，而是無以為家，並厭惡歸屬感，逃避責任，無法對任何地方或群體付出情感與關懷，甚至被保守人士解讀為不愛國或叛國。

四、法國大革命初期國家公民權之定義

接下來探討法國國家公民權之變化。從制度面來看，1790年代的法國政府，從國民會議到國民公會，再到山岳黨(La Montagne, 黨員為 les

³⁵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 80.

³⁶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p. 80-81.

³⁷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vol. 1, p. 81.

Montagnards, 是雅各賓黨中最激進的一派)掌權，逐漸清楚地界定國民身分，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法國革命政府對於公民身分的定義，已和舊政權時代不同，也不同于英國激進分子的認知。社會學者巴魯巴克(Rogers Brubaker)在 1989 年提出，從制度面——國家公民身分的形塑——討論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性，及國族主義的發展，³⁸其概念在 1992 年出版的《法國與德國的公民權和國家建立》(*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中有更詳細的論述。³⁹他認為，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性是展現在 1792 年後激進排他的國家主義上，而不是接納世界各地外來者的世界主義階段。⁴⁰另外，學者托比曾批評安德森等人的論述，認為其忽略了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國族主義不僅是形成了「想像的」共同體，主張 1790 年代法國對於公民身分的認定過程，護照的發放和管制，才真正形塑了我們所熟悉的、清楚明確、具備實質公民權利義務關係的現代民族國家。⁴¹巴魯巴克等學者的研究中強調國家公民權與現代國家的形成關係密切。就現代國家發展進程上，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仔細審視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社會現象則不難發現，國家公民權的發展過程裡不表示世界主義就在法國退席，或歐洲社會對於公

38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Citizenship," pp. 30-49.

39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40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Citizenship," p. 42. 1990 年代以來一直以種族、語言、文字、信仰，乃至於他我對立與國族想像為主流，巴魯巴克從國家制度面研究西歐國族主義發展，這一取向較少受到歷史學者的重視。筆者認為政府從證件上建立實質公民身分，國家公民概念不再抽象遙遠，補強了安德森等人在民族國家論述上的不足。

41 John Torpey,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p. 18. 書中托比以國家對於公民身分和護照的發放、壟斷和制度化來探討國家共同體的形成，強調共同體的形成必須經過編纂(codify)成檔案的過程，不可能僅透過想像而形成。

民的觀念就快速改變。

法國大革命初期高唱自由平等，歡迎全世界的自由之友來到法國，國民會議的討論和決議可見其脈絡，1790年4月30日議員塔戈(Guy-Jean-Baptiste Target, 1733-1806)提出一套將法國境內外國人歸化為公民的法令計畫，獲得大會通過。⁴²5月1日國民會議宣布廢除舊政權時期對外地人(foreigners, 此指巴黎以外的人)的不平等法條《外國人遺產沒收權》(droit d'aubaine)，議員馬珊·楓于廉(Jean-Louis-Charles-François de Marsanne, 1741-1815)繼而提出，博愛精神適用於所有認同革命者，往後國內不再有家族派系，也不再有國籍之分，新政府歡迎熱愛自由的各界人士前來，並保護其天賦人權。⁴³同年8月議員巴瑞爾(Bertrand Barère de Vieuzac, 1755-1841)提議，基於博愛原則，歸化後的公民(前外國人)也有機會成為積極公民(le citoyen actif)，擁有政治權利。雖然此案經過一番爭論，但國民會議主席同意法國境內凡認同《人權與公民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和法國的人，皆享公民權利，並平等享有參與政治機會。⁴⁴1791年公布之法國憲法中又再次重申法國境內外國人之歸化法令，並保護其基本人權與公民權，歸化公民得以和本地人一樣簽約、接受財物贈予，也可以自行安排其財物，人身和其財產、產業都一概受到憲法保護，此外，若收入達到標準，他們能成為積極公民。⁴⁵

必須注意的是，這樣的世界主義和博愛理念，背後已經設下框架，「認可法國大革命理念」自大革命初期就是一個重要門檻。爾後每一

⁴²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15, p. 340.

⁴³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15, p. 349. 關於十八世紀法國新舊政權對於〈外國人遺產沒收權〉的爭論和處置，以及該法令廢除後與國家公民權發展之關係，參見 Peter Sahlins, *Unnaturally French*, pp. 215-312.

⁴⁴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17, pp. 628-629.

⁴⁵ Constitution de 1791, Titre II et III.

次出現暴動、貴族反抗或與他國宣戰，都迫使法國執法機關重新檢討如何區分敵我，排除外人，例如 1791 年 6 月王室出逃事件(Fuite de Varennes)後，國民會議不斷在討論是否該以護照來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⁴⁶

不過，直至 1792 年底，法國掌權派系釋放善意，歡迎世界各地支持大革命者前來巴黎，提供政見。1792 年 8 月國民公會更公布一批英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獲得法國榮譽公民權。⁴⁷革命初期的政策吸引各國支持自由理念者前去法國旅居，一直到 1793 年排英法令出現，才正式暫停外國人前往巴黎。在 1792 年成立之共和政府中相關規定，所謂的「外人」未必是法定邊界外的人，也包括政治邊界外的人，也就是法國境內不效忠革命政府者，如流亡者(émigrés)，貴族，反共和政府者，不宣示效忠新政府的教士(refractory priests)，和地理疆界上的外國人一樣同為外人，都可能是國家的敵人。反之，政治行動上或政治思想上支持革命理念、但未居留在法國者，也可受頒法國榮譽公民，進而擁有政治權利。⁴⁸因此該定義下之「公民」與「外人」與政治立場密切相關，國籍因素反而不見得具必要性，故塔利安(Jean-Lambert Tallien,

⁴⁶ 例如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27, pp. 429, 448.

⁴⁷ 國民會議宣布榮譽公民名單，參見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48, pp. 688-691;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49, pp. 10-11. 1792 年 8 月 26 日獲頒榮譽法國公民者包括普斯利、潘恩、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克萊森(Thomas Clarkson, 1760-1846)、麥金塔許(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以及大衛·威廉斯(David Williams, 1738-1816)等 7 位英國人(包含已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的潘恩)。另有美國人如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普魯士人、瑞士人、義大利人、荷蘭人與薩克森人等 17 位。

⁴⁸ 關於國民會議對於榮譽公民的條件、理念和人選的討論經過，參見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48, pp. 688-691.

1767-1820)曾表示到，「在法國境內，凡外人皆是壞公民」。⁴⁹

薩林斯曾謂，外國人遺產沒收權的廢止意味著現代的「國籍」(nationality)和「公民權」(citizenship)的出現，認為這是了解現代公民權——法定國民，具政治參與權——出現的唯一途徑。⁵⁰薩林斯以外國人遺產沒收權的變化作為單一解釋國家公民權建立的方式，固然詳盡說明了關於外國人的法律規定，卻簡化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國籍概念轉變之複雜性，也忽略了十八世紀「世界公民」概念猶存的問題。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公民權認定，部分精神乃延續十八世紀以來的世界主義精神，如聖皮埃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 1658-1743)提倡永久和平，提出國際和平秩序的理念，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對於宗教迫害和戰爭的批判，以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認為天賦人權乃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普世概念，這些概念都影響到大革命初期，革命人士以世界主義對待支持大革命之外國人士。支持大革命理想和行動的外國人——所謂的「自由之友」，只要持有合法證件，通常不會被視為「外人」，得以自由進出法國。對於法國革命人士而言，外國人受到法國大革命感召，來到法國觀察和學習，將帶給其原生國更為自由平等的制度，將法國大革命推展到歐洲各地，正符合法國新政府所望。不過，

⁴⁹ 引自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p. 47.

⁵⁰ Peter Sahlins, *Unnaturally French*, p. 16. 薩林斯在該書中論到，1750年代開始了「公民權革命」(citizenship revolution)，法國大革命快速推動了第二次公民權革命，至1819年大抵告一段落，公民權概念從啟蒙哲士所勾勒的世界主義式公民權，轉為新的、現代的、有國籍概念、政治權的公民權。維托爾德文登(Cathérine Wihtol de Wenden)也曾在其論文〈法國的公民權和國籍〉中指出「國籍」(nationality)和「公民權」(citizenship)是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漸結合，將歷史中兩個不同本質的概念做連結。不過該論文篇幅短，而且著重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法律層面(制度面)的變革，與本文主題不同。Cathérine Wihtol de Wende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 in France," pp. 85-94.

仍需強調，儘管世界主義猶存，法國新政權下的公民權概念已經開始朝向以國籍和政治概念為基礎的現代國家公民觀。換句話說，是由中央政府所認定，簽發的公民權利，而非個人自主宣稱的認可。而英國激進分子和許多法國共和黨員，如羅素姊妹在海上所遇到的法國共和黨員，尚未了解箇中變化。

五、英國政治激進人士對於公民之定義

啟蒙時代所謂的世界公民精神，秉持人文主義精神，批判專制和威權，不獨鍾家鄉，尊重並關心全人類，強調寬容，各民族國家和平互動，充分實踐理性。⁵¹啟蒙時代的世界公民強調的是道德上對於人類社會的同情與寬容，隱射個人在任何社會中的獨立和自由，及人與人間的平等，但是尚未具備清楚的政治理論。十八世紀英國對於世界公民的討論，最著名的應屬愛爾蘭藉劇作家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既道出作者對世界公民的嚮往，也揭露當時社會對世界公民的猜疑和批評。⁵²又如 1762 年法

⁵¹ 對伏爾泰、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等人而言，啟蒙時期的「世界公民」或「世界主義」在「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具批判意識、跨國界、獨立於政府和教會權力之外的自由空間——中展現無遺。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也曾在 1784 年《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和 1795 年《永久和平論》(*Toward Perpetual Peace*)在其著作中，闡釋世界公民觀，表現出啟蒙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歐洲知識分子對於「世界公民」的肯定態度。Immanuel 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pp. 3-16; Immanuel Kant, “Toward Perpetual Peace,” pp. 67-109.

⁵² Oliver Goldsmith,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本意為各國知識分子皆可自由參與的談話性社群，具獨立性和世

國編定第四版的《法蘭西學院辭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時增加了「世界公民」(*cosmopolite*)一條，意為「不屬於任何國家的人」，文後緊接著註解：「世界公民不是好公民。」⁵³學者哈薩德(Paul Hazard, 1878-1944)指出，盧梭在《愛彌兒》(*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中也如是嘲笑世界公民，他們在書中尋找道理，卻藐視了他們周遭的責任。⁵⁴可見得整體而言世界公民和世界主義是一道德信念，體現理性和熱愛全人類等高超素質，卻也容易被批評和質疑。在 1790 年代，「世界公民不是好公民」的說法最常出現在英國對於政治激進派人士或法國革命黨人的批評。前述威廉的言行，在船上的英國人眼中也就落入此框架中——世界公民宣稱熱愛全世界，其實只是掩飾其無法愛自己家鄉

界主義特質。然而，高德史密斯將「文人共和國」描繪為一群不具寬容、不團結的知識分子，互相攻伐和輕視，不見容他人，也就無法形成緊密連結的團體。由此可見，作者對於世界公民理念能否實踐存疑。關於十八世紀西歐文人對於「世界公民」定義之探討，可參考 Mary Helen McMurrin, "The New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22-33. 另外，Paul Hazard, "Cosmopolite," pp. 354-364. 文中對於十七世紀下半葉至十八世紀末法國文學家或思想家作品中，運用到世界主義概念者，皆做了整理，可惜哈薩德本身鮮少論述。

⁵³ *Dictionnaires d'autrefois: Dictionnaires des 17ème, 18ème, 19ème et 20ème siècles*, <http://portail.atilf.fr/dictionnaires/onelook.htm>, accessed 30 May 2014. 不過在 1798 年編定的第五版《法蘭西學院辭典》中，略作刪增，改為世界公民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人」，「世界公民視全宇宙為他的家鄉」。條文中對於「世界公民」做出正面解讀，刪除負面「不是好公民」之敘述。

⁵⁴ Paul Hazard, "Cosmopolite," p. 360. 哈薩德除了舉盧梭之例，也列了許多其他貶「世界公民」之文句，Paul Hazard, "Cosmopolite," pp. 359-361. 此外，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也談到世界公民。盧梭指出人類在發展中喪失了原初社會的自由與同情心，以致於只有少數真正的世界公民才保有這樣的精神，打破分離人類的想像疆界，追隨上帝的典範，在仁愛中擁抱全人類。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p. 174.

和祖國的事實。⁵⁵

從啟蒙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時代，世界主義逐漸和政治思想產生連結。這個現象在 1790 年代尤其明顯；英國激進人士普遍支持法國大革命初期所強調的普世性、超越國界的政治思想——天賦人權、自由和平等觀，以及 1792 年後的逐漸重要的博愛(*fraternité*)精神。⁵⁶法國革命人士主張，凡支持革命理念的外國人皆被視為法國人之兄弟，自由之友，感動一批英國激進人士。在博愛精神下，全世界支持自由平等者皆為手足，看似與世界主義精神雷同。所以英國激進分子將不具政治理論世界主義的內涵，和具政治理論的「普世性」(*universalism*)——如自由、平等適用於全人類的政治理念——緊密結合，甚至混淆在一起。

羅素一家人就是將世界主義和政治理念結合的明顯例子，秉持世界主義，支持自由和天賦人權等普世性政治理念。英國支持法國大革命者，如普萊斯和威廉斯，皆曾在著作中定義自我為世界公民，並對於世界公民定義做出解釋。1789 年 11 月，普萊斯在《論愛本國》(A

⁵⁵ 1790 年代初期，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也曾對自詡為「世界公民」的激進人士提出批評，認為這些人就如同盧梭提出天賦人權，卻將自己的孩子遺棄在孤兒院，或普萊斯和相關政治改革團體成員自以為擁抱全人類的同時，犧牲了他們對於地方或國家的忠誠和情感。簡言之，在柏克看來，這些人支持法國的「新哲學」(*new philosophy*)之時，忘卻了英國長久以來的憲政、道德和宗教傳統。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p. 7; Edmund Burke,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p. 35.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推展中被奉為主臬，盧梭也被英國保守派歸類於大力擁抱世界主義的人物，批判盧梭一面宣揚天賦人權、提倡幼兒教育，卻從未善盡人父之責。諷刺的是，盧梭被批評的內容與盧梭自己在 1760 年代對於世界公民的質疑如出一轍。

⁵⁶ *Fraternité* 的本意更接近兄弟愛，同胞愛，是在某特定範圍內視對方為手足朋友，而非無限制的「博愛」。不過因為中文慣將 *fraternité* 譯為博愛，故沿用原翻譯。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佈道文中強調，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和訴求，不僅侷限在法國境內，更具備長遠的目標，去啟蒙世界。⁵⁷普萊斯的佈道文中，既結合了愛國精神與世界主義，也將世界主義結合了普世性政治思想。在他看來，愛本國是「愛支配的表現……是透過擴張領土和奴役其他國家，顯示出自身對於偉大和榮耀的渴望」。⁵⁸任何政府都可能朝專制主義發展，故吾人應該勇於捍衛自己的權利，抵抗腐敗政治。⁵⁹而法國正是將自由理念帶像全歐洲，超脫本國之範圍，將和平和幸福也推展到他國：

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吾人應該將自己的眼界超越國家的範圍。
吾人應當熱愛本國，但不具排他性。吾人應該在任何情況許可之能力範圍內，追求國家進步；但是同時吾人必須視自己為世界公民，小心地為他國的權利主持正義。⁶⁰

對於擁抱世界主義的英國激進人士而言，法國大革命體現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世界公民理念，如英國詩人威廉斯在 1790 年 7 月來到巴黎後記下，只要具人性，支持法國大革命的人們，來到巴黎都成為「世界公民」。⁶¹故她在巴黎觀察大革命的旅行書寫，並非以外國人

⁵⁷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pp. 11-15.

⁵⁸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p. 5.

⁵⁹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pp. 19-20.

⁶⁰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p. 10.

⁶¹ 英國女性詩人威廉斯於 1790 年 7 月抵達巴黎後，至 1796 年陸續寫了八冊《旅法書簡》(*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記錄對於巴黎的觀察與對於大革命的感動。其著作在 1792 年以前受到英國讀者的歡迎，然而在 1792 年 9 月大屠殺後，多數英國人逐漸不再認同大革命，也期待威廉斯在其書信中描述大革命的暴力和不公義。令英國讀者失望的是，威廉斯依舊支持法國大革命理念，導致她本來在英國讀者心中的溫婉女性形象不再，轉被描繪成受到法國污染而墮落的女性，喪失原本良善的英國好女性的性情。由此也表示出國際情勢會影響人民區分敵我，界定身分，世界公民或愛國激進

的身分出發，而是從世界公民的視角來參與、感受，她實際上就是巴黎的一分子。⁶²事實上，在 1789 年之前未曾出現女性將自己比為「公民」或「世界公民」，可見得法國大革命爆發後，普世性理想確實帶給英國女性成為世界公民的希望。再者，十八世紀文人對「世界公民」提出批評時，常指他們冷漠、不關心地方，乃至於無情感歸屬，威廉斯卻回應到，「只需具備普通人性的人，都可以在此刻(此指 1790 年 7 月 14 日)成為世界公民」，在法國找到了歸屬感。⁶³另一位英國激進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2 年底來到巴黎，她在書信中表示法國對於外來人的友善，超過其他國家。⁶⁴初來到巴黎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往來於威廉斯和潘恩的社交圈，熟稔英美法激進人士，也在威廉斯的沙龍中認識吉倫特黨(la Gironde)領導人物，認同吉倫特黨員(les Girondins)的理念，⁶⁵吉倫特黨亦請沃斯通克拉夫特著手女子教育或男女同校教育之方案。⁶⁶

普萊斯和威廉斯在敘述世界公民概念時，將世界公民與人性、好

人士也可能被定義為叛國者或冷血無感情者。Deborah Kennedy, "Benevolent Historian: Helen Maria Williams and her British Readers," pp. 317-336; M. Ray Adams, "Helen Maria William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14-117; Mary A. Favret, "Spectatrice as Spectacle: Helen Maria Williams at Home in the Revolution," pp. 273-295.

⁶²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in the Summer 1790, to a Friend in England, Containing Various Anecdotes Relativ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69.

⁶³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p. 69.

⁶⁴ "Mary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24 December 1792, in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Janet Todd, p. 215.

⁶⁵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Paris, 24 Dec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 226.

⁶⁶ "Wollstonecraft to Ruth Barlow," Paris, 1-15 February 1793,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 230.

的、良善的價值觀，以及同情自由和人權等理念畫上等號。威廉斯注意到自古以來對於世界公民的批評，也就是世界主義者有不忠於任何城市或國家之嫌，她也了解自己對於法國當前局勢公開表示關心的舉動，被許多英國人懷疑是不良英國女性，既不忠於英國，又不守婦道，擅自進入專屬男性之公領域，公然談論「政治」——傳統上屬於男性的課題。⁶⁷因此她為自己辯護，訴諸普遍人性，強調只要「具備普遍的感知能力(common sensibility)，必能對法國大革命——帶給普世幸福的革命——表示同情」。⁶⁸威廉斯再次聲明自己世界公民的立場，強調普世關懷。她的世界公民觀訴諸人性和情感，其公民觀不具現代政治權利概念和國籍。

潘恩也曾提到「世界公民」一詞，而他確實具備多重國籍身分。潘恩出生英國，生為英國子民，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強而有力的鼓吹北美十三州人民獨立，成立共和、保護人民自由之政府，他也因此成為美國公民。在 1778 年的《危機》(*Crisis*)第七章中潘恩已經清楚表明其世界公民的角色和立場：他強調共和、人權和自由等理念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為的是全世界人類的福祉，原因無他，只因他的「情感執念是對於全世界，而不是針對特定地區」。⁶⁹此番言論符合前述對於世界主義和普世性政治理念之解釋。潘恩在 1792 年 8 月獲頒榮譽法國公民，同年 9 月被選為卡萊(Calais)地區代表，進入國民公會，參與

⁶⁷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p. 91. 關於質疑威廉斯不守婦道又背叛英國的論述，Laetitia Matilda Hawkins, *Letters on the Female Mind, Addressed to Miss H. M. William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r Letters from France* 是其中著名一例。

⁶⁸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p. 91.

⁶⁹ Thomas Paine,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The Crisis*, No. 7, 21 November 1778, in *Collected Writings: Common Sense, The Crisis, and Other Pamphlets, Articles, and Letters*, ed. Eric Foner, p. 197.

新政府運作。

潘恩的寫作中，他的「同胞們」(fellow-citizens)既是法國共和黨員，也是英國激進分子。例如 1792 年 9 月底潘恩寫信給「倫敦通訊協會」(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的「同胞們」(fellow-citizens. 筆者按，此指英國同胞)，指出他自己不僅成為法國公民，更被「我的同胞們」(my Fellow-Citizens. 筆者按，此指法國人)選為國民公會議員。⁷⁰潘恩相信，在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浪潮中，「愛國精神」(patriotism)和「公民權」(citizenship)已超越國家邊界的侷限，不再僅限於某一國家或地區。⁷¹他一再指出，法國發生革命的理由也適用於全人類，全世界各國都應該享有自由，皆應秉著「和平」和「公民權」之原則，建立「人的共和國」(Republic of Man)。⁷²在這封公開信件的尾聲，潘恩強調法國大革命不僅限於法國的疆域，而是「每個國家都成為她的同盟，每個宮廷都成為她的敵人」，所有國家的公民皆共同對抗所有的宮廷，也就是政治特權、專制主義和貴族，「讓我們在偉大的友誼中展開新時代，為聯盟與勝利的接近而歡呼」。⁷³法國藉由頒發外國人榮譽公民的過程中強調公民的政治認同和政治角色，然而在英國激進分子的眼中看到卻是博愛精神和世界公民理念的實現，不帶有國籍和政治權利關係的公民觀，本質上與法國政府所擬定的大不相同。

潘恩公民權概念中的國籍分野極模糊，只要理念相同，英國、法國、美國人都可以是他的同胞、兄弟；在情感上，只要政治理念相同，

⁷⁰ Thomas Paine, "Letter of Thomas Paine, to the people of France: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gratis by 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in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1792-1799*, ed. Michael T. Davis, vol. 1, p. 41.

⁷¹ Thomas Paine, "Letter of Thomas Paine, to the people of France," p. 41.

⁷² Thomas Paine, "Letter of Thomas Paine, to the people of France," pp. 42-43, 45.

⁷³ Thomas Paine, "Letter of Thomas Paine, to the people of France," p. 46.

吾人可以愛本國，亦可愛他國人民。他對於「公民權」和敵人的解釋，呼應了法國大革命初期對於公民權的界定，不過他的理想共和國，不帶有政治權利問題和國家公民權概念。潘恩強調的是在普世的國度中，人人皆是享有天賦人權的公民，皆是手足同胞。他也明白表示對於狹隘的愛國主義反感，批評愛國主義分離各國間的情感。潘恩的「人的共和國」是共和美德的展現，國與國之間得以友善和平相處，待他國人民如同胞。這些概念有異於法國當時以法律規範公民權，並強調國籍和政治權。

又如另一位受頒榮譽法國公民的英國國民——邊沁，⁷⁴他在接受這樣榮譽時表示，他出生以來即具有的「英國子民」身分總是會優先於「法國公民」這個新身分。他認為每個國家各有適合她的政治體制——只要這個體制或變革能讓大部分人民得到幸福。因此他希望自己一方面在倫敦是保皇者(royalist)，在巴黎則是共和人士(republican)。⁷⁵他在信中也堅持他視所有法國人為他的「兄弟」(my brethren)：「是的，我是如此——每個法國人都是我的兄弟；確實，他什麼時候不是兄弟了呢？」⁷⁶邊沁的政治思想與本文中大部分激進分子有所出入，然而除卻政治思想部分，吾人可以從邊沁的言論中看出其愛國意識與世界主義兼顧，也是與法國的公民權概念迥異。

此時期的法國人不再使用過去的封建階級頭銜，革命政府給予凡

⁷⁴ 邊沁是難以定位的改革派人物，推動社會和司法改革，言論自由，主張功利思想，既不認同柏克強調的歷史傳承和社會階級，1791年後又批評《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和潘恩等人的天賦人權理論，不認同法國逐漸走向民主的政策和恐怖政策。他也在1792年8月和潘恩與普斯利等人一起獲頒法國榮譽公民。

⁷⁵ “Bentham to Jean Marie Roland de la Platière,” 16 October 1792,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ed. Timothy L. S. Sprigge, pp. 401-402.

⁷⁶ “Bentham to Jean Marie Roland de la Platière,” 16 October 1792, p. 402.

效忠革命者「公民」(citoyen, citoyenne)稱謂，凡稱公民者，皆是兄弟，是朋友，也就是博愛。⁷⁷不少英國激進派團體，如「倫敦通信協會」和「憲法資訊協會」成員，⁷⁸也仿效法國，將自己的稱謂改為「公民」，稱英國激進人士和法國共和黨員為「同胞」，充分展現世界主義和博愛精神。再者，吾人可見 1792 年以後英國激進人士所撰之支持英國國會改革、支持共和體制之政治小冊，為避免政府追緝而多以匿名出版，有些則以「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world)之名出版，⁷⁹即具體證明 1790 年代世界主義和激進共和主義結合，兩者關係密切。⁸⁰1792 年 9

⁷⁷ 關於 fraternité 的定義，可參見 Mona Ozouf, "Fraternity," pp. 694-703.

⁷⁸ 「憲法資訊協會」在 1780 年代至 1794 年期間英格蘭各大城市皆可見，如倫敦，伯明罕，雪菲爾(Sheffield)，積極鼓吹國會改革，在 1790 年代大力傳播潘恩之著作，出版各類激進書籍和小冊子。「倫敦通信協會」於 1792 年 1 月成立，致力推動國會改革和人民普選權，宣傳和教育人民天賦權利概念，在曼徹斯特、雪菲爾、諾里琪(Norwich)等地也都有「通信協會」。1790 年代的愛丁堡、里茲(Leeds)、曼徹斯特等城市還有其他激進派團體集會活動。關於「憲法資訊協會」和「倫敦通信協會」等激進派團體集會記錄，皆收入《十八世紀經典古籍全文資料庫》(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http://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FUNC270>, accessed 25 May 2014. 「倫敦通信協會」的所有出版品也都整理成冊再版，參見 Michael T. Davis, ed.,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1792-1799*.

⁷⁹ 詳細資料可由《十八世紀經典古籍全文資料庫》和大英圖書館目錄(The British Library Main Catalogue)查詢得知。

⁸⁰ 1770 年代支持美國革命之英國激進人士偶爾也以「世界公民」為名出版政治小冊(兩筆)，但 1790 年代以「世界公民」之名出版的激進人士顯然支持與法國友好，並鼓吹英國根本的轉型為共和體制。再者，1792 年後英法之間外交局勢轉惡，1793 年初英法開戰，英國激進分子的政治立場被指為支持敵國，對英國君主立憲政體不忠，再由大量保守文宣宣傳和渲染下，「世界公民」/ 激進人士難以強調其愛國精神，進而被大部分英人視為叛國者。關於英國國內在 1790 年代如何看待或敵視激進人士之「愛國者」和「世界公民」身分，不是本文探討之主題，將另撰論文探討之。

月，「倫敦通信協會」會長瑪格洛特(Maurice Margarot, 1745-1815)代表其會員寫信至法國國民公會，信中指出：

法國人，你們已經自由了，而英國人也準備如此。過去我們[筆者按，此指英法]之間的偏見是由於邪惡、老謀深算的臣子所灌輸。我們終於發現，法國人是我們有如同胞般的世界公民(our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是天父所造之兄弟。天父創造我們的目的是讓我們互相愛對方、幫助對方，而不是去恨彼此……由美國、法國和英國人民——而非王室——所組成的三國同盟將帶給全歐洲自由，帶給全世界和平！摯友們，你們是為了全人類更進步而戰鬥！⁸¹

其一方面表明了英國激進團體視法國人為「世界公民」的和平互動精神，也呼應了法國大革命的博愛(兄弟愛)精神。另一方面，這樣的世界公民概念中也結合了普世性的政治理念，也就是期盼英國追隨法國的步調，讓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和人權。

從 1790 年代英法兩國辭典中對於「公民」定義的差距，吾人亦可看出英國政治激進人士在公民概念上仍未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在「公民」(citizen)這個英文詞彙的使用上，十八世紀末英國激進作家皮戈特(Charles Pigott, ?-1794)在其著作《政治辭典》中解釋到，「公民」是「最具榮譽的稱號；具美德的人」，⁸²這個解釋方式是延續古典和啟蒙時代以來對於「公民」的解釋，不具國家概念，也不具實質政治權利。1790 年代英國激進分子的公民觀還未出現革命性變化，吾人從普萊斯、威廉斯、潘恩的詞彙中皆可見到這類富哲學或道德意味的公民意義。法國大革命爆發後，英國激進分子開始自稱「公民」，此公民實際上有

⁸¹ Maurice Margarot, "Address to the French National Convention," in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1792-1799*, ed. Michael T. Davis, vol. 1, p. 30.

⁸² Charles Pigott, *A Political Dictionary Explaining the True Meaning of Word*, p. 9.

親法、支持自由平等博愛之意，實際上也就是世界公民的代名詞。反觀法國對於公民(citoyen)一詞，則是從大革命前不具國籍概念的定義：「城市中的居民；古羅馬公民，不單指在羅馬出生的人，也可以指擁有羅馬公民的特權和權利的外國人。」⁸³到 1798 年第五版的《法蘭西學院辭典》中又添加上一條解釋：「全法國人和自由國家的人，他們都享有公民權。」⁸³顯示出在法國的定義中，唯有具備自由平等型態之政府的國民才是公民，也表示出國家公民權概念，英法公民觀已出現分歧。因此，1790 年代英國激進人士的公民觀和世界公民觀，仍保留了古典公民觀。公民是好的、具道德的、愛國的人，也具備公民權利(civil rights)，如自由權和生命權，與法國的現代的公民權概念不同。如同盧梭批評近代早期法國的「公民權」，認為「公民」這個稱號僅表示了「美德」，而沒有「權利」內容。在盧梭的觀念中，一個社群內的公民有如平等合夥關係，透過「社會契約」授權全體公民為主權所在，行使政治權。法國大革命對公民之定義即展現出盧梭的概念。

據以論之，英國激進人士的公民觀和 1790 年代的法國政府推行的政策不同。法國大革命初期的世界主義接納外國人，效忠大革命者得以歸化為法國公民，甚至頒布榮譽公民給世界各地對於自由和平等有貢獻之政治家或思想家，排除公民權中的法定疆界限制(不需在法國境內出生)，特別強調政治忠誠，並讓這些人具備政治參與權。反觀英國激進人士，他們也未必反對英國憲政傳統，他們講的世界主義是道德概念中的寬容與和平，個人的獨立性和天賦人權，故可能依舊具原國籍與原效忠之政治立場，不具「歸化為法國人」的想法。換句話說，即使看似皆基於世界主義而勾勒出的公民觀，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國政

⁸³ *Dictionnaires d'autrefois*, <http://portail.atilf.fr/dictionnaires/oneLook.htm>, accessed 30 May 2014.

府已經在推動具政治權利和以政治忠誠為導向的公民權，從哲學意義上的公民概念轉為有國籍和政治權利性質的公民權，而英國的世界公民則仍屬啟蒙時期的觀念。再者，當法國的公民權加入了國籍和政治權概念後，「世界公民」的想法就變得不可能。因此，在 1790 年代的英國激進人士在公民觀念上與法國新政權法令出現明顯落差。

法國政府在界定公民身分與外人身分的時候，來到法國的英國激進分子自視為世界公民，自認是參與法國大革命的公民。革命初期法國政府定義的公民權與英國激進人士的公民概念看似不相牴觸，皆主張世界主義和博愛，其實本質上已有差異，進而 1793 年後法國政府積極建立的國家公民權，此概念和英國激進分子自視的公民權矛盾性更大。英國激進人士忽略了法國博愛精神的排外性質。對法國政府而言，博愛精神歡迎全世界自由之友來到巴黎，看似具備世界主義，其實法國政府在管控公民和外人身分上，尤其是山岳黨主政後，已與世界主義漸行漸遠，日益區分他我，排除非我，並且，非兄弟者，即敵人，甚至可以動用死刑處置之。不過，法國公民權概念的轉變也不是一蹴可幾，生活在此時期的巴黎，內涵複雜的身分問題。

六、恐怖時期的法國國家公民政策

在 1790 年後法國新政權的法令下，境內的「外人」可能是國內的煽動或叛國分子和反革命人士，或來自境外的間諜，故對「外人」普遍抱持警覺。法國王室在 1791 年 6 月企圖變裝出逃奧地利，結合外國勢力如奧地利和普魯士以干預法國大革命，導致法國國民大會不同派別間不斷辯論和訂定相關法令，試圖掌控境內人民身分和限制公民或外人出入境，主張以極小的「不自由」來捍衛大革命確立的「自由」，杜絕國內外反革命分子和國外政權的掛勾。瓦尼(Sophie Wahnich)的研究提

到，共和政府以警察制度監督法國境內居民並管控「外人」，使「外人」成為法律審查身分和管控行動的對象，故對法國政府而言，「外人」是帶來恐懼、危險的人，也是法國的敵人。⁸⁴瓦尼也進一步指出，在相關監督「外人」的單位中留下的資料上，對於外人描述不會針對個人特徵或特性描述，外人通常會被描述參與特定組織，是間諜或叛國者，會帶給國家和人民恐懼和危險。⁸⁵

再者，如前文提及，法國大革命中的博愛(兄弟愛)精神中已假設出一個邊界，唯有對革命效忠者才是兄弟，違者即為敵人，所以無論是世界主義時期或仇視外人時期，法國大革命政策皆展現出博愛精神。1792年末至1795年間，「自由，平等，博愛，或者死亡」(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or death)越來越頻繁出現在國民公會議員紀錄中，英國報紙刊物也爭相報導，⁸⁶其排外和暴力性表露無遺。是以，即便在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時期，其法律和警察監管制度中已經帶有恐外、排外的內容。時至1794年春天，塔利安所述的「在法國境內，凡外人皆是壞公民」更精闢道出箇中特質。

1792年後法國大革命走向了激烈，大革命戰爭陸續爆發，1793年2月英法開戰，更是直接將對方視為敵人。在法國境內的英國人也因

⁸⁴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l'étranger dans le discou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32-33.

⁸⁵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p. 33. 亦參見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pp. 122-123, 151.

⁸⁶ 例如 "Letter from General Moreau,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Morning Chronicle*, 27 Feb 1794; "Equality, Liberty, Fraternity, or Death!," *Lloyd's Evening Post*, 11 July-18 July 1794; "Foreign Affairs," *St James' Chronicle or British Evening Post*, 11 April 1795; "Real Reformation!" *St James' Chronicle or British Evening Post*, 6-8 October 1795. 法國大革命時期，凡法國新法令新政策公布，隔幾日後英國各大報紙都翻譯成英文，刊登給英國讀者。

為法國法令中視交戰敵國為「外人」，對外人政策轉嚴厲，進入尷尬處境。1793 年初因應新建立之共和國而起草吉倫特黨憲法(Le Plan de constitution girondin)，草案主導者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在 1792 年表示其憲法原則，堅持世界主義精神，主張在法國境內不論男女和種族皆應擁有公民身分，反對狹隘的國族概念，認為法國不應因為戰爭的到來而放棄普世自由與平等的理念，法國國門應該一直為所有的自由之友而開。⁸⁷吉倫特黨在 1793 年上半葉逐漸失勢，被更激進的山岳黨取代。雖然其憲法草案胎死腹中，同年 6 月通過之山岳黨憲法在條文上依舊秉持世界主義，對於境內外國人的歸化較 1791 年憲法更為寬鬆，在公民權的規定上，凡是居住在法國，且政治上認同當權者，皆擁有政治權利。⁸⁸這使得原本的世界主義加上了政治認同的但書。換句話說，政治成為世界主義的邊界。

1793 年憲法的內容具法式世界主義——即強調政治忠誠為前提之世界主義。此後，各項法令規定則開始嚴厲審查境內旅居者，即使是支持革命的外國人，也就是在革命初期不屬於「外人」範疇的人，也不例外。隨著歐洲和英國陸續對法國宣戰，法國革命政府對於「外人」的恐懼逐漸成真，在大革命戰爭的想像中，外人的政治身分就是大革命的敵人，遍佈法國境內境外。國民公會議員對待外國人的態度逐漸轉為不信任，其政策轉為嚴厲和敵視。巴黎地區國民公會議員羅伯特(François Robert, 1763-1826)在 1793 年 4 月表示：「我愛全人類；我尤

⁸⁷ The Marquis de Condorcet Condorcet, "A Survey of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Draft Constitution(1793)," in *Condorcet: Foundations of Social Choice and Political Theory*, eds. and trans. Iain McLean and Fiona Hewitt, pp. 213-215.

⁸⁸ 詳文請見 *Constitution du 24 juin 1793*, <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francais/la-constitution/les-constitutions-de-la-france/constitution-du-24-juin-1793.5084.html>, accessed 18 June 2014.

其愛所有自由人；但我愛法國的自由人更勝於世界上的其他自由人。」⁸⁹這位法國官員先是表現出大革命初期的世界主義觀，和對凡是支持自由理念者皆是兄弟的博愛精神；同時，更重要的，他也進一步表現出國家意識，區分他我，並將吾國置優先地位。這一段話已清楚表明 1793 年法國政策的變化與排他意識大增。

1793 年 3 月後國民公會成立的公安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於同年 3 月至 10 月屢屢訂法規下令逮捕任何可能背叛法國革命政府的嫌疑犯，尤其是「過去的貴族和壞公民」。⁹⁰同年 9 月公布嚴厲的《嫌疑犯法條》(la loi des suspects)，凡是與大革命理念為敵、與敵方有關係者，未到地方當局註冊並通過審問者，未備有公民證明者，與貴族相關之後代或親屬、卻未對大革命活動效力者，都是嫌疑犯，交由公安委員會處置審問。⁹¹因此，法國政府嚴格檢查與監視巴黎城內可能成為大革命敵人者，強調政治忠誠，違者即被逮捕。1793 年 10 月 9 日公布排英法令和 10 月 16 日公布排外法令，與法國交戰者和未宣示效忠者皆被逮捕，英國激進分子也在此列。同年 10 月 16 日之後，停留在法國境內的所有敵國人民(與法國交戰國之國民)成為階下囚。⁹²1793 年 12 月後，只有出生在法國且支持法國大革命者才是法國公民，並享有政治權，國籍成為公民是否擁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重要條件，支持大革命不再是主要條件。是故法國政府重新界定政治權，擁有政治權資格的公民，必須是生長在法國的法國人。國民公會議員聖茹斯特(Louis

⁸⁹ “François Robert to National Convention,” 26 April 1793, 節錄自 Chimene I. Keitner, *The Paradoxes of Nationalis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ts Meaning for Contemporary Nation*, the front page.

⁹⁰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vol. 60, pp. 51-65, pp. 293-294, 492-496.

⁹¹ 關於《嫌疑犯法條》，參見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vol. 74, pp. 303-305.

⁹²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vol. 76, pp. 639-645.

Antoine de Saint-Justt, 1767-1794)在 1794 年 4 月曾提出激進的肅清敵人計畫，強調唯有嚴格區分外人——包括外國人和舊貴族——和公民，禁止外人在巴黎等大城市、港口等地區出現，不得集會結社，才能建立一個沒有外敵、僅有法國人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公民都是朋友，友善如手足。⁹³

七、恐怖時期旅法英國政治激進分子之遭遇

當時身處法國的潘恩尚未體認到法國大革命逐漸走向極端的嚴重性。潘恩曾在 1792 年底參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r. 1774-1791)的審判，運用不同公民身分來解釋自身立場，主張路易十六應該為 1791 年 6 月出逃事件(Flight to Varennes)接受公開審判，並被判刑，因為路易十六不僅背叛了法國人民，更密謀與歐洲專制政府合作，阻礙歐洲其他國家之民主化。⁹⁴1793 年 1 月 15 日潘恩再次寫信至國民公會，卻是反對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主張將路易十六送至美國，遠離法國王室對他的影響，讓他在美國了解公平、平等的代議制度和為民喉舌的政府的運作方式。⁹⁵潘恩指出，路易十六在 1791 年 6 月密謀聯合國外勢力，企圖重返王位，此計畫被識破逮捕時，潘恩自己還不是法國公民，但是身為「世界公民」，他嚴正反對反革命勢力重返法國。⁹⁶

潘恩「世界公民」一詞的運用，與威廉斯和普萊斯的「世界公民」

⁹³ 引自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 2.

⁹⁴ Thomas Paine, "On the Propriety of Bringing Louis XVI to Trial," 21 November 1792, in *Thomas Paine: Life and Works*, ed. Moncure Daniel Conway, vol. 3, pp. 114-118.

⁹⁵ Thomas Paine, "On the Propriety of Bringing Louis XVI to Trial," 21 November 1792, pp. 119-124.

⁹⁶ Thomas Paine, "Reasons for Preserving the Life of Louis Capet," 15 January 1793, in *Thomas Paine: Life and Works*, ed. Moncure Daniel Conway, vol. 3, p. 120.

相通，既包含世界主義中不獨愛本國，關懷全人類，強調寬容和理性，也結合了普世性政治理念，支持法國大革命理念，期待將之推至全歐洲，甚至全世界。關於是否處死路易十六的議題上，潘恩的身分與立場既是美國公民，也是法國公民。首先，由於獨立戰爭期間法軍曾援美，所以他不願處死路易十六。他指出：「我以美國公民身分提出[反對處死路易十六]，因為我對每個法國人心懷感激。」同時，他也從一個人(man)的立場提出：「儘管我視國王為敵，亦謹記國王也受制於人性弱點。」因為路易十六生在皇宮權力之中，無從了解自由平等之美意。另一方面，他亦表示：「我以法國共和的公民身分來支持我的提議，我相信自己所提的意見是最符合政治程序的處置方式。」⁹⁷他認為近代以來的革命，「大部分群眾雖然在立意和理想是正義的，在完成其目的時，真正使用的方法上，往往忽略其初衷」，導致革命過程中發生純粹報復的舉動。⁹⁸他更進一步從人道觀點出發，主張「廢除死刑」，認為「凡已啟蒙的政治家和熱愛人類者(enlightened politicians and lovers of humanity)皆應擁護此意見，更重要的是，此會議中應該也有這樣的擁護者存在」。⁹⁹吾人可見潘恩對「非我」——路易十六，既是貴族也是叛國者——仍秉持寬容、人道立場，即反映出啟蒙時代之「世界公民」內涵。

1793年1月19日，潘恩在國民公會中表達對於投票通過路易十六被判死刑感到遺憾。¹⁰⁰山岳派議員馬拉(Jean-Paul Marat, 1743-1793)回應到，由於潘恩屬桂格教派(Quaker)，其信仰反對死刑，潘恩不夠資格參

⁹⁷ Thomas Paine, "Reasons for Preserving the Life of Louis Capet," 15 January 1793, p. 122.

⁹⁸ Thomas Paine, "Reasons for Preserving the Life of Louis Capet," 15 January 1793, p. 123.

⁹⁹ Thomas Paine, "Reasons for Preserving the Life of Louis Capet," 15 January 1793, p. 124.

¹⁰⁰ Thomas Paine, "Speech in the Convention," 19 January 1793, in *Thomas Paine: Life and Works*, ed. Moncure Daniel Conway, vol. 3, pp. 125-127.

與投票。¹⁰¹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雅各賓黨人雖行動上開始肅清政敵，但一直到同年 12 月底前，仍然接納像潘恩這樣的「外國人」——英國／美國激進分子進入核心政治機構。馬拉是以宗教因素為由反對潘恩在國民公會中表達意見，而非國籍因素。是故，若不從制度面來看，在國家意識、敵我之分快速增強的革命法國，公民的國籍分野仍具模糊性，未必成為雅各賓黨人形塑單一公共意見的工具。

恐怖時期國家公民權逐漸確立，敵我意識清楚，仔細觀察英國激進分子的生活，卻也未必全然失去行動自由，而法國革命政府的政策所未必體現出「國家公民權」之確立，其政策往往流於政治清算，公民權中政治效忠之重要性先於原生國籍問題。旅居巴黎的威廉斯與其家人在 1793 年 10 月 9 日當日被捕，監禁在盧森堡宮(the Luxembourg Palace)，而後又轉至「英國女修道院」(the convent of Les Anglaises)監禁約 6 星期。¹⁰²威廉斯在 1792 年 8 月再次抵達巴黎，而後永久居住於此，其個人經驗也就與法國大革命的局勢變化糾葛在一起。1792 年至 1827 年間，威廉斯在愛爾維修街(Rue Helvétius)的住所成為法英美激進人士聚會的文學與政治沙龍。¹⁰³威廉斯認同吉倫特黨理念，並將 1792 年以

¹⁰¹ Thomas Paine, "Speech in the Convention," 19 January 1793, p. 127.

¹⁰²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from the Thirty-first of May 1793, till the Twenty-eighth of July 1794, and of the Scenes Which Have Passed in the Prisons of Paris*, vol. 1, p. 17.

¹⁰³ 英美人士如沃斯通克拉夫特、羅素一家、潘恩、克利斯帝(Thomas Christie, 1761-1796)、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巴洛(Joel Barlow 1754-1812)、費滋傑羅(Lord Edward Fitzgerald, 1763-1798)等皆曾拜訪威廉斯住所。威廉斯與吉倫特黨核心人物來往密切，在吉倫特黨人得勢時，布里索(Brissot, 1754-1793)、羅蘭夫婦(the Rolands)、佩雄(Pétion, 1756-1794)、韋尼奧(Vergniaud, 1753-1793)時常在威廉斯的沙龍中醞釀或交換意見，巴瑞爾也時常在此和吉倫特黨人見面。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vol. 1, pp. 170-171.也參考"Wollstonecraft

前的吉倫特黨革命(the Girondin Revolution)和之後的雅各賓恐怖統治(the Jacobin Terror)區分開來。¹⁰⁴威廉斯的政治立場與身分必定成為巴黎公安委員會的眼中釘。吉倫特黨人在 1793 年 10 月已陸續被處死或被迫自殺，威廉斯一向與吉倫特黨人交好，又留有吉倫特黨人或與吉倫特黨人親近人士之手稿和來往書信，她自覺會是山岳黨掌權後的清算對象，考量家人和自身生命安全，遂主動焚毀了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 1754-1793)、拉索思(Marc-David Lasource, 1763-1793)等人的遺稿和書信，使得公安委員會難以查獲威廉斯與吉倫特黨人深交的信件。¹⁰⁵筆者推斷威廉斯至少表現出尊重當權者，規避政治風險，也許是威廉斯沒有被長期監禁的主因。此外，1793 年後威廉斯雖嚴厲批判法國雅各賓黨，但該著作卻以匿名方式在倫敦出版。¹⁰⁶

潘恩在美國革命期間擁有美國公民身分，在 1792 年 8 月授頒榮譽法國公民身分，一度可能是代表法國國民公會訪美並推動法美聯盟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Paris, 24 December 1792, p. 226.

¹⁰⁴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from France: Containing a Great Variety of Interesting and Origi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that Have Lately Occurred in that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Respecting the Campaign of 1792*, vol. 1, pp. 3-18, 23-24, vol. 2, p. 269;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vol. 2, pp. 78-79, 212-214.

¹⁰⁵ Helen Maria Williams, *Souveni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81.

¹⁰⁶ 威廉斯不擅長政治理論分析，往往訴諸情感，其 1793 年出版之《旅法書簡》依舊為大革命理想辯護，勸世人不應因同情路易十六之死而忘卻全人類的自由。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from France*, vol. 1, pp. 3-18, 23-24, vol. 2, pp. 214, 217-218, 265. 她在 1795 年出版的書中大力批判羅伯斯比爾、馬拉、丹東(Georges Danton, 1759-1794)等人，犯下的罪惡遠超過過去歷代君主所為，導致法國陷入無政府、邪惡、與無知的混亂狀況中。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vol. 2, pp. 78-79, 90, 212-214.

的代表。¹⁰⁷潘恩在 1793 年 12 月被逐出國民公會，送入盧森堡宮監禁，直到恐怖統治結束才被釋放。潘恩被監禁之官方理由是他的外國人身分——他在英國出生，是英國子民，不足以代表法國人民。實際上導致潘恩被捕並長期監禁的主因，與他和此時已失勢的吉倫特黨人密切往來有關，更因為潘恩反對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直指國民公會的恐怖政策不符人性，淪為報復手段，這些言論和政治立場不合乎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等人之政策。吉倫特黨人紛紛失勢，潘恩曾在 1793 年 5 月初致丹東的信件中表達出對於法國共和政府當前狀況的失望，指出「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和博愛理念曾經散播歐洲各地」，¹⁰⁸吸引各界熱愛自由和改革的人士前往巴黎，現下大革命理念卻難以在歐洲各地開花結果，「原因並不是外國勢力聯手防堵革命勢力擴張，也不是貴族和教士階級的干預，而是法國大革命內部的混亂失序行為所造成」。¹⁰⁹法國如火如荼的政治鬥爭使得大革命發展陷入瓶頸。他可理解當前法國對於外國政府的敵視態度，但這不是問題的核心，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最後潘恩批評到，22 位吉倫特黨官員的失勢與入獄就是派系鬥爭下的錯誤決定和致命損失。他直指這批吉倫特黨人是他所知最具大革命理想，也是最愛法國者。¹¹⁰潘恩極差的法語能力讓他雖身為國民公會議員，卻未意識到羅伯斯比爾等人已經在肅清政敵，準備以恐怖的手段加速大革命的推動，清除反革命——其實是指反山岳黨人——聲音，達成純淨的公共意志。潘恩的

¹⁰⁷ Thomas Paine, "To Gouverneur Morris," Luxembourg, 24 February 1794, in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ed. Philip S. Foner, pp. 1338-1339.

¹⁰⁸ Thomas Paine, "Letter to Danton," Paris, 6 May 1793, in *Thomas Paine: Life and Works*, ed. Moncure Daniel Conway, vol. 3, p. 135.

¹⁰⁹ Thomas Paine, "Letter to Danton," Paris, 6 May 1793, p. 135.

¹¹⁰ Thomas Paine, "Letter to Danton," Paris, 6 May 1793, p. 139.

世界主義和政治理念，與當權的山岳黨人背道而馳。

潘恩在 1793 年春遷居巴黎郊區聖丹尼斯(Saint-Denis)，遠離政治核心，然而阿拉斯地區(Arras)——羅伯斯比爾家鄉——官員指控潘恩與吉倫特黨人關係密切，不適任加萊地區國民公會議員，又指出潘恩不僅反對處死路易十六，更與叛國之吉倫特黨人同調。¹¹¹此外美國駐法全權公使(United States Ministers Plenipotentiary to France)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政治理念與潘恩不同，對他早有嫌隙，潘恩被逮捕後，莫里斯也未積極向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澄清潘恩仍具備有效的美國公民身分，不適用 1793 年 10 月 9 日之法令。¹¹²此處可見導致潘恩被捕的名義是具英國籍，但真正因素是政治不正確，批評羅伯斯比爾等人的政策，未效忠當權派系之理念。潘恩無論從法定國籍或從政治立場來看，都已不屬於法國憲法所定義之公民，而是「外人」，是法國的敵人。

沃斯通克拉夫特則是因為名義上成為美國公民妻子，而不被視為「外人」的英國人。她在 1793 年初已在巴黎美國大使館註冊為美國公民伊姆雷(Gilbert Imlay, 1754-1828)妻子，雖從未舉行婚禮儀式，名義上已具美國身分，並且她於 1793 年 6 月移居巴黎郊區訥依(Neuilly-sur-Seine)，遠離政治中心，逃過一劫，未被逮捕下獄。¹¹³她直到 1795 年中才回到倫敦。這是 1793 年後表現在對「外人」政策上的另一政治

¹¹¹ Thomas Paine, "Appeal to the Convention," Luxembourg, 6 August 1794, in *Thomas Paine: Life and Works*, ed. Moncure Daniel Conway, vol. 3, pp. 147-148.

¹¹² 關於莫里斯的立場，參見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p. 190-191.

¹¹³ "Mary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Neuilly-sur-Seine, June 1793,"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 231. 在巴黎的友人往往稱沃斯通克拉夫特為「伊姆雷夫人」(Mrs. Imlay)。請見 Martha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pp. 18, 19, 42; Mary Russ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p. 3.

現象；此時期法國政府對於公民權的解釋已經沒有模糊性，然而，法國未與美國交戰，也就不將美國公民為「外人」，不是法國政府清除的對象，所以沃斯通克拉夫特具美國籍後，就不是法國政府眼中的敵人。

看似政治正確的她，其實在 1793 年初時常出入英國激進作家威廉斯的社交圈，並認同法國吉倫特黨員理念。她不贊同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手段，批判巴黎的政治混亂，¹¹⁴但這些觀察或以書信寄往英國，或未出版。沃斯通克拉夫特於 1793 年 2 月寫下的〈關於當今法國特性的一封信〉(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在文中批判她所觀察到的法國大革命亂象，但是此文並未在她生前出版，直到 1798 年過世後才問世。¹¹⁵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3 年夏開始著手撰寫《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與進展》(*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探討法國大革命進入到恐怖時期之癥結。¹¹⁶該書於恐怖時期結束後才在英國出版。因此，1792 年底至 1794 年她對法國政治的負面評論皆未即時問

¹¹⁴ 例如，在 1792 年 12 月 26 日的書信中，伍氏的巴黎經驗充滿了對於動亂和流血事件的恐懼，時時看到人頭落地，時時有人在對面公寓中監視。

“Mary Wollstonecraft to Joseph Johnson, Paris, 26 Dec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 227.

¹¹⁵ 文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比較來到法國前後對於法國和法國人觀感的認識和改變，從中表示到不再能樂觀地認為革命會進展到一個純粹民主的黃金時代。在她的觀察，新政權的政治權力仍掌握在部分人手中，在這樣新舊體制的交替中，官員依舊腐化，渴望權勢，故惡(evil)是無論何種形式的政府或理想崇高的革命中都會存在的現象。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s.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vol. 6, pp. 439-446.

¹¹⁶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1794).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s.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vol. 6, pp. 1-236.

世。此外，從沃斯通克拉夫特於 1793 年至 1795 年間的書信得知，她幾次暗示信中不宜多談政治，局勢詭譎，此時期英法往來信件都可能被拆閱檢查，她寫信回英國，僅報平安。¹¹⁷這些資料都顯示出，恐怖統治期間沃斯通克拉夫特淡出政治與文人社交圈，同時因為具美國籍，法國此時的排外政策是針對敵對國籍者，而法國視美國公民為盟友，故美國不在此列，這些都讓沃斯通克拉夫特得以生活在巴黎郊區而維持某種程度的人身自由。

1794 年 7 月熱月政變(the Thermidorian Reaction)後，國民公會再度鬆綁對於護照的管控，然而對於非法國出生者的身分依舊持嚴格的認定制度，能夠留在法國境內的外國人大多是來自法國友邦，或是 1792 年以前以來到法國，或是其「愛國精神與正直」(patriotism and probity)得到公安委員會的認可，被授與「安全卡」(carte de sûreté)，然身分證明需隨時攜帶，並受官方監控。¹¹⁸因此羅素一家人會在海上有一番遭遇，而羅素一家成為戰俘後，威廉不斷寫信促使美國大使出面交涉，終使巴黎公安委員會同意釋放羅素一家。英國激進分子在這段時期的紀錄呈現出十八世紀末葉國際間他我意識漸強，外交關係改變導致法國政府

¹¹⁷ “Wollstonecraft to Eliza W. Bishop,” Neuilly-sur-Seine, 13 June 1793; “Mary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Le Havre, 19 March 1794,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p. 232, 248. 直到 1794 年 7 月的信件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才粗略提及 1793 年 10 月法國政府抵制英國人和英國物品的法案：「至於這邊的狀況，以及抵制英國人的法令，我不會多說。」不過她仍在信中表達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血腥代價感到心痛。“Wollstonecraft to Ruth Barlow, Havre,” 8 July 1794,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 257. 不過，即使沃斯通克拉夫特迴避政治議題，在 1793 至 1794 年間幾乎避不談法國政府政策和排外法令，吾人亦可察覺政策轉變對旅法英國激進人士之影響——對於直言不諱、喜評論時事和觀察社會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不發言便是一種控訴。

¹¹⁸ John Torpey,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pp. 48-50.

對(敵對國)移民者態度轉劣，所謂的公民權界定，實際推展上以政治黨派立場為主導，推之則中間有許多法國當權派的人為因素，展現的不見得是國家公民權的落實。此外，羅素一家被釋放的過程，可見法國重視與美國的外交關係，足以影響法國政府對待羅素一家人的態度。法國政府對待境內美國公民的態度，並不是法國對於國家公民權的解釋模糊，而是受到國際政治關係的影響。

八、尾聲——英法對於「世界公民」和「公民權」之歧見

最後，被迫流亡或旅居海外的英國激進人士，面對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之交歐美對於公民權界定之轉變和國際間矛盾衝突不斷，他們是否認識到自視之「世界公民」身分和公民概念已與法國新政權的定義出現分歧？英國激進分子在經歷國際衝突後，對於世界公民的態度是否轉變？吾人可從潘恩、威廉·羅素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書寫中看到其世界公民觀和公民觀中猶存啟蒙特色，而這樣的公民觀，始終與法國新式具國籍與政治權利的公民權不相同，甚至他們並未察覺到自身所遭受的劫難，多少與英國激進人士的公民權觀念未跟上法國的公民權概念有密切關係。

潘恩在被監禁期間寫給當時給美國駐法全權公使莫里斯和續任的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的書信中，不斷強調他在美國革命期間之貢獻以及具備美國公民身分，不再是英國公民，並申明 1792 年後他前往法國乃是因為他認同法國大革命對於自由和公民權利的理想，也申明法國國民公會授與他榮譽法國公民身分，不表示他放棄美國公民身分。換言之，他具備法美雙重國籍，且皆有效力。他在信中也一再

希望美國政府再次出面確認其公民身分。¹¹⁹羅伯斯比爾倒台後，潘恩也於 1794 年 8 月寫信致國民公會自我申辯，強調他在 1787 年以美國公民身分離開美國，希望將共和政府和自由精神推展到全歐洲，然而法國大革命的派系鬥爭卻陷他於不義，置他於囹圄。他指出，當初 1793 年羅伯斯比爾黨羽（該議員代表阿拉斯地區，阿拉斯是羅伯斯比爾家鄉）誣陷他以一介「外人」身分參政，但是事實是 1792 年法國在奧地利、普魯士準備攻打法國的危急時刻，合法「邀請」他來到法國，授與他公民權和政治權，所以他遠非無端參與法國政治，更不是毫無身分的參與。¹²⁰更有甚者，他繼續自陳，他是美國公民，不同於其他與法國為敵的國家，美國是法國友邦，不在國民公會法令中所定義之「外人」。¹²¹是故，就算他是外國人，也是支持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和共和政府的美國公民。這裡既顯示出他個人身分認同，也因為當時外交局勢上，法國當局希望爭取美國同盟，對抗英國。因此，若美國大使出面證明其美國公民身分，則法國很可能會釋放他。在申辯信的尾聲，他仍舊祝福「法國的博愛和繁榮」。¹²²最終，他在 1794 年 11 月獲得釋放。

潘恩的解釋中，即一再強調自己是美國公民、是法國的盟友，應

¹¹⁹ Thomas Paine, "To Gouverneur Morris," Luxembourg, 24 February 1794; "To James Monroe," Luxembourg, 18 August 1794; "To James Monroe," Luxembourg, 25 August 1794; "To James Monroe," Luxembourg, 10 September 1794; "To James Monroe," Luxembourg, 4 October 1794; "To James Monroe," Luxembourg, 13 October 1794; "To James Monroe," Luxembourg, 13-20 October 1794; "To James Monroe," Luxembourg, 20 October 1794, in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ed. Philip S. Foner, pp. 1338-1339, 1342-1374.

¹²⁰ Thomas Paine, "Appeal to the Convention," Luxembourg, 6 August 1794, pp. 148-149.

¹²¹ Thomas Paine, "Appeal to the Convention," Luxembourg, 6 August 1794, p. 149.

¹²² Thomas Paine, "Appeal to the Convention," Luxembourg, 6 August 1794, p. 149.

受法國友善對待，遑論他具法國榮譽公民身分，而羅伯斯比爾等人不了解此博愛真諦，操弄派系鬥爭，有違人性。從其言論可知，他認為國民會議時期的法國秉持博愛精神，將之與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做連結，恐怖時期博愛精神不再，他希望羅伯斯比爾倒台後，新政府再次恢復該精神，才是恢復大革命初衷。看來他不明白，無論是宣稱世界主義的革命初期或後來排外的恐怖時期，法國一樣都秉持博愛精神，區分他我——認同我者為手足同胞，違者乃是外人、敵人。不過，隨著大革命戰爭的發展，國民公會對於成為法國公民的條件越開越緊，並對於非我者祭出更嚴厲的懲處。更有甚者，同樣具美國公民身分的英國人，低調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則從未被法國公安委員會逮捕，而屢在國民公會中發出異議、高調強調自身美國公民身分的潘恩(甚至他也擁有榮譽法國公民身分)卻受牢獄之災，再次表示出此時法國國民公會所認可之公民，不僅是通過宣示、國籍正確，更是不大聲違抗當前山岳黨恐怖政策者。

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 1790 年代中期日漸高漲的國家主義感到不耐，在她看來這是思想狹隘的表現。1795 年的《北歐書簡》(*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中，她認為旅行各方並不是為了比較他我孰優孰劣，批評異文化，應去探討該文化內涵，在這樣的探討中，吾人信以為真、但實為人造的國民性才可能被摧毀。¹²³在挪威時，她觀察到大多數人都愛國，但缺乏「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據她解釋，此精神也就是更高層次的「大美德」(the grand virtue)，關注所有人類，並且具備此大美德需要更高的理解力。¹²⁴對於沃斯通

¹²³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p. 93.

¹²⁴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p. 103.

克拉夫特而言，世界主義的道德和理解層次遠高於狹隘的國家主義。沃斯通克拉夫特承襲洛克的理論，不講英國古憲法，強調的是「所有人」——超脫「英國人」的文化、歷史獨特條件或範圍限制——的天賦人權，¹²⁵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自由和幸福是全世界性的。¹²⁶她的書信和作品中一直強烈批判柏克等英國惠格派政治人物吹捧的古憲法，自以為英國歷史傳承下來的憲政已保護世代英格蘭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權。¹²⁷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帶給她新希望，在 1792 年底隻身抵達巴黎，往後她提及英國時更是不帶眷戀。1795 年初春，她寫道，英國是一個「失去任何魅力」的國家，其社會對待她和她的女兒的態度令她「厭惡到近乎恐怖」的地步。¹²⁸在《北歐書簡》中她批評彼特政府統治下，英國言論不復自由，¹²⁹而 1796 年書信中又再次批判英國已經失去其自豪的自由傳統，1792 年後的英國充斥著痛恨

¹²⁵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p. 43.

¹²⁶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p. 83.

¹²⁷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pp. 43, 75;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pp. 31, 86. 柏克的保守政治思想，在 1790 年代政府與保守人士的文宣宣傳，以及法國紛亂的政治與戰爭推波助瀾下，逐漸被大部分英國人所接受，發展成為一普遍的國民意識型態。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直不認同柏克的言論。

¹²⁸ "Wollstonecraft to Imlay," Paris, 19 February 1795,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 280. 其實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僅簡短形容過女性在法國較為自由，在《法國大革命》一書中，她雖然批評法國人的性格，卻也留下幾句稱讚法國人的段落。她指出，「在法國，女性行為較有自由，她們較能夠決定自己的個性，對人也較為寬厚」。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48.

¹²⁹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p. 105.

「自由」的政治風氣。¹³⁰沃斯通克拉夫特對英國既有制度感到失望，對於 1790 年代強烈反「自由」思想的政治掃蕩極為厭惡。另一方面，從沃斯通克拉夫特屢次欲棲身法國來推斷，¹³¹即便在法令上強調區分敵我的時代，大革命下的法國社會依舊對於「自由之友」有某種程度上的尊重和理解，加上她已註冊為美國人的妻子，在國籍解釋上有某種寬容性，以致於沃斯通克拉夫特仍然願意選擇居住於法國，也繼續支持大革命理念和世界主義。

羅素一家人在 1795 年夏天來到美國。他們對美國抱持著高度期待，但是時局的改變，法美外交關係在 1790 年代末期轉劣，美國社會充斥排外思想與反法國大革命之情緒。¹³²美國居民因為羅素一家人

¹³⁰ “Wollstonecraft to Hamilton Rowan,” London, 12 September 179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 349.

¹³¹ “Wollstonecraft to Imlay,” Paris, 19 February 1795, p. 280; “Wollstonecraft to Hamilton Rowan,” London, 26 January 179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 Ralph M. Wardle, pp. 328-329; “Wollstonecraft to Imlay,” London, November 1795, in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to Imlay with Prefatory Memoir*, ed. C. Kegan Paul, pp. 185-186.

¹³² 1795 年起，美國聯邦黨(Federal Party)試圖以《歸化法》(*the 1795 Naturalization Act*)管控移民歸化美國籍，要求至少在美居住 5 年，而想要申請歸化的「良善」「自由」的白人應在提出申請前 3 年就向政府單位提報申請歸化為美國公民。1798 年後法美雖未開戰，實質上關係劍拔弩張，亞當斯(John Adams, 1735-1826)當選總統後，聯邦黨推動國會通過《外國人與煽動叛亂法案》(*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嚴懲批評政府與總統者和煽動叛亂者，授權總統驅逐境內敵對國籍人士(包括具法國籍人士)或具叛亂可能(即言論親法且散播親法思想)的外國人。在申請歸化為美籍公民的程序上，也由居住 5 年的要求也延長為 14 年。直到 1801 年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上任，隔年共和黨成為國會中多數黨後，《外國人與煽動叛亂法案》中各項法規被撤銷或逾期終止。關於 1790 年代以後美國公民身分的制定，參考 Andreas Fahrmeir, *Citizenship*, pp. 27-37. 儘管未曾聽聞美國總統或官方使用此法案

與法國人交情好而疏遠他們，威廉和湯馬斯認為「當地人思想狹隘，宗教不寬容」。¹³³早他們來到美國的英國激進派移民也感受相同的敵意，如普斯利在 1795 至 1801 年的書信中屢次提到，他在美國始終感覺自己是外來者，當前的主政者對於移民至此的英國激進分子表現出「荒謬的敵意」(ridiculous jealousy)。1798 年秋，普斯利再次提到，「地方居民對於英國移民者態度令人難以置信」，只要具法國公民身分或支持法國大革命就足以招致地方人民對他們的厭惡。¹³⁴羅素家人也在同樣的處境之中，為求生活安全而逐漸離群索居——即使威廉、湯馬斯和普斯利一樣都已成為美國公民。因此，1798 年後，羅素一家人思考該回到法國還是英國。瑪莎在 1799 年與其夫婿回到英國，瑪麗和其弟也在兩年後回到英國。

拿破崙(Napoleon, 1769-1821)崛起後，威廉·羅素的世界公民熱情和宗教熱情又再度燃起。威廉在 1801 年前往法國，但是因為他在法國的房產問題和國際情勢的再次轉變，拿破崙戰爭於 1803 年 5 月再次爆發，他一直到 1814 年才又回到英國。1800 年代他暫居法國諾曼第，一方面籌劃建立唯一神派教會，一方面繼續其人道事業，不分信仰與國籍，幫助地方居民物質生活，贏得「窮人的父親」(le père des pauvres)的

驅逐親法英國移民，英國激進人士的確感受到其言論和居住自由受到威脅。

¹³³ S. H. Jeyes, *The Russells of Birmingha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America, 1791-1814*, pp. 256-276.

¹³⁴ “Dr. Priestley to Rev. T. Lindsey,” Northumberland, 12 July 1795; “Dr. Priestley to Rev. T. Belsham,” Northumberland, 25 October 1798, in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ed. John Towill Rutt, pp. 312, 408. 普斯利在與威廉·羅素書信往來中也寫到美國地方上對於英國激進分子的敵意。參見“Dr. Priestley to William Russell,” 10 November 1795, in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ed. John Towill Rutt, pp. 321-322.

美名。¹³⁵他在法國時曾表示，即使身為虔誠的新教徒，他依舊愛全人類，包括天主教徒，「沒有理由因為不同的觀點就使人與人疏遠」。¹³⁶他展現出熱愛自由，致力以實際行動改善社會的人道精神；同時，他也關心其他社會，願意友善對待他人，或採納其他國家或文化之優點，以達到從改善人類社會的目標。這是典型世界主義的表現。他始終沒有體認現代公民權概念與其世界主義之摩擦和衝突，導致他們一家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時期奧迪賽般的流浪旅程。

因此，法國大革命時期西歐國家對公民身分和國籍概念的界定依舊有模糊之處，連法國政府的政策上，其法令服務於當前得勢派系，也就難免於前後反覆之虞。故薩林斯指出的公民概念的改變，在大方向來說是正確的，但是又不免簡化了法國大革命時代「身分」和「國籍」概念產生轉變時的複雜性。托比、巴魯巴克或薩林斯等學者從制度面探討國家公民權發展時忽略制度或法律的變革往往先於社會的變化，僅從制度面著手恐怕未能掌握社會真正的面貌。

造成人民對於公民權認知上的模糊性之原因，一是從啟蒙運動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時期，世界公民概念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後結合大革命初期的自由平等理念，再連結到 1792 年後逐漸出現的博愛精神。如是變化後的世界主義與普世性政治理念，是 1790 年代英法激進和共和人士看待外界的主流方式。不過，如本文所論，英國激進人士的解釋方式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策出現差異。前者對於公民的解釋依舊是哲學性的解釋，具道德的概念；後者則是實際界定一國成員，是法定概念。二是法國新政府的法令在派系鬥爭時被革命人士拿來作為權謀的手段。表面上建立以國家為分界、強調政治忠誠的公民權，給

¹³⁵ Thomas Russell, "Memoir of the Late William Russell, Esq.," p. 147.

¹³⁶ William Russell, *Supplicatory Addresses to the One Everliving and True God*, pp. xxiii-xxiv.

予政治權利，驅離或逮捕外人，但實際上此政策是針對與主流派系意見相左、可能成為威脅的外國人和反革命分子，因此政治立場正確與否才是真正影響排英法令和排外法令公布後，英國激進分子是否身陷囹圄之主因，故公民權成為了派系鬥爭下的政治宣示。

(本文於 2014 年 11 月 18 日收稿；2015 年 2 月 25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愛國主義抑或世界主義？——論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激進派的認同困境」(計畫編號：102-2410-H-030-083-MY3)的部分研究成果。蒙科技部的經費協助，特此致謝。感謝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對於本文論點深化助益良多。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繁花似錦：文明交會、人群匯流與個人境遇」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14 年 11 月 15 日)，得到與會學者的提問與指教，在此一併致謝。

徵引書目

一、原始史料

- An Impartial Report of the Debates on the Suspension of the Habeas Corpus Act*. London, 1794.
-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Première série (1787 à 1799). Paris, 1862-1914.
- Burke, Edmund. Ed by L. G. Mitchell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urke, Edmund.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London, 1791.
- Conway, Moncure Daniel, ed. *Thomas Paine: Life and Works*. Vol. 3.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6.
- Davis, Michael T., ed.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1792-1799*. 6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Equality, Liberty, Fraternity, or Death!,” *Lloyd’s Evening Post*, 11 July-18 July 1794.
- Foner, Philip S.,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 1.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69.
- “Foreign Affairs,” *St James’ Chronicle or British Evening Post*, 11 April 1795.
- Goldsmith, Oliver.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London, 1762.
- Hawkins, Laetitia Matilda. *Letters on the Female Mind, Addressed to Miss H. M. William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r Letters from France*. London, 1792.
- Kant, Immanuel.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1784).” In *Toward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 Peace, and History*, edited by Pauline Kleingeld, translated by David L. Colclasure, pp. 3-1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Kant, Immanuel. “Toward Perpetual Peace (1795).” In *Toward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 Peace, and History*, edited by Pauline Kleingeld, translated by David L. Colclasure, pp. 67-10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etter from General Moreau,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Morning Chronicle*, 27 Feb 1794.
- Liberty and Property Preserved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 A Collection of Tracts*. 9

- vols. London, 1793.
- McLean, Iain and Fiona Hewitt, eds. and trans. *Condorcet: Foundations of Social Choice and Political Theory*. Aldershot: Elgar, 1994.
- Milne, Alexander Taylo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Vol. 4.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1.
- Kegan, Paul C., ed.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to Imlay with Prefatory Memoir*. London: C. Kegan Paul, 1879.
- Paine, Thomas. *The Crisis*. In *Collected Writings: Common Sense, The Crisis, and Other Pamphlets, Articles, and Letters*, edited by Eric Foner.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5.
- Pigott, Charles. *A Political Dictionary Explaining the True Meaning of Word*. London, 1795.
- Price, Richard.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London, 1790.
- “Real Reformation!” *St James’ Chronicle or British Evening Post*, 6-8 October 1795.
- Rousseau, Jean-Jacques.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1755).” In *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pp. 111-1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ussell, Martha. *Martha Russell’s Account of the Birmingham Riots of 1791*. Birmingham City Archives. MSS 486799.
- Russell, Martha.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3 vols. Birmingham City Archives. MSS 660349.
- Russell, Mary. *Journal of a Tour to America in 1794-1795*. 2 vols. Birmingham City Archives. MSS 660357.
- Russell, Thomas. “Memoir of the Late William Russell, Esq,” *The Monthly Repository of Theology and General Literature*, 13 (March 1818), pp. 153-155.
- Russell, William. *Supplicatory Addresses to the One Everliving and True God, with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by Theophilus Browne*. Gloucester, 1818.
- Rutt, John Towill, ed.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Vol. 2. London: R. Hunter, 1831.
- Todd, Janet, 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ardle, Ralph M.,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illiams, Helen Maria.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in the Summer 1790, to a Friend in England, Containing Various Anecdotes Relativ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0). Edited by Neil Fraistat and Susan S. Lanser.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1.
- Williams, Helen Maria. *Letters from France: Containing a Great Variety of Interesting and Origi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that Have Lately Occurred in that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Respecting the Campaign of 1792*. 2 vols. London, 1793.
- Williams, Helen Maria.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from the Thirty-first of May 1793, till the Twenty-eighth of July 1794, and of the Scenes Which Have Passed in the Prisons of Paris*. 2 vols. London, 1795.
- Williams, Helen Maria. *Souveni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27.
- Wollstonecraft, Mary.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6).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pp. 58-200.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 Wollstonecraft, Mary.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1794).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ited by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vol. 6, pp. 1-236. London: Pickering, 1989.
- Wollstonecraft, Mary.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ited by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vol. 6, pp. 439-446. London: Pickering, 1989.
-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790). I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nd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D. L. Macdonald and Kathleen Scherf, pp. 31-98.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1997.

二、近人論著

- Adams, M. Ray. "Helen Maria William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McLean Harper*, edited by Earl Leslie Griggs, pp. 87-117. Princeton, 1939.

- Alliston, April. "Transnational Sympathies, Imaginary Communities." In *The Literary Channel: The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of the Novel*, edited by Margaret Cohen and Carolyn Dever, pp. 133-14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 Brubaker, William Rog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Citizenship," *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 7:3 (July 1989), pp. 30-49.
- Brubaker, Rogers.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olley, Linda. "Britishness and Otherness: An Argument,"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1:4 (October 1992), pp. 309-329.
- Colley, Linda.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Craciun, Adriana.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itizens of the Worl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Dickinson, H. T. "Popular Loyalism in Britain in the 1790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England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Eckhart Hellmuth, pp. 503-53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Dickinson, H. T. "Popular Politics and Radical Ideas." In *A Companion to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edited by H. T. Dickinson, pp. 97-111. Oxford: Blackwell, 2002.
- Dozier, Robert R. *For King, Constitution, and Country: the English Loyalis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 Fahrmeir, Andreas. *Citizenship: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Concept*.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Favret, Mary A. "Spectatrice as Spectacle: Helen Maria Williams at Home in the Revolution," *Studies in Romanticism*, 32:2 (Summer 1993), pp. 273-295.
- Fitzsimmons, Michael P.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Invention of Citizenship."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 of Citizenship*, edited by Renée Waldinger, Philip Dawson and Isser Woloch, pp. 29-41. London: Greenwood, 1993.
- Goodwin, Albert. *The Friends of Liberty: The English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79.

- Hazard, Paul. "Cosmopolite." In *Mélanges D'Histoire Littérai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 offerts à Fernand Baldensperger*, vol. 1, edited by Baldensperger Fernand, pp. 354-364.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30.
- Jeyes, S. H. *The Russells of Birmingha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America, 1791-1814*. London: George Allen & Co., 1911.
- Keitner, Chimene I. *The Paradoxes of Nationalis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ts Meaning for Contemporary Nation Build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7.
- Kennedy, Deborah. "Benevolent Historian: Helen Maria Williams and her British Readers." In *Rebellious Hearts: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Adriana Craciun and Kari E. Lokke, pp. 317-33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 McMurrin, Mary Helen. "The New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7:1 (Fall 2013), pp. 19-38.
- Michael Duffy, "William Pit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Loyalist Association Movement of 1792," *Historical Journal*, 39:4 (December 1996), pp. 943-962.
- Newman, Gerald.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e History 1740-183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 Ozouf, Mona. "Fraternity." In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François Furet and Mona Ozouf,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 pp. 694-670. Cambridge, Mass.;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Rapport, Michael.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789-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 Robertson, John. "The Enlightenment above National Context: Political Economy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and Napl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0:3 (September 1997), pp. 667-697.
- Rose, R. B. "The Priestley Riots of 1791," *Past and Present*, 18:1 (1960), pp. 68-88.
- Sahlins, Peter. *Unnaturally French: Foreign Citizens in the Old Regime and Aft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orpey, John.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Venturi, Franco. *Italy and the Enlightenment: Studies in a Cosmopolitan Century*. London:

Longman, 1972.

Wahnich, Sophie. *L'impossible citoyen: l'étranger dans le discou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Wihtol de Wenden, Cathérine.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 in France." In *From Aliens to Citizens: Redefining the Status of Immigrants in Europe*, edited by Rainer Bauböck, pp. 85-94. Aldershot: Avebury, 1994.

三、網路資料

Constitution de 1791. 網址：<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francais/la-constitution/les-constitutions-de-la-france/constitution-de-1791.5082.html>. 擷取日期：2014年6月18日。

Constitution du 24 juin 1793. 網址：<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francais/la-constitution/les-constitutions-de-la-france/constitution-du-24-juin-1793.5084.html>. 擷取日期：2014年6月18日。

Dictionnaires d'autrefois: Dictionnaires des 17ème, 18ème, 19ème et 20ème siècles. 網址：<http://portail.atilf.fr/dictionnaires/onelook.htm>. 擷取日期：2014年5月30日。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網址：<http://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FUNC270>. 擷取日期：2014年5月25日。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itizenship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Identity Problem of British Radical Expatriates in France

Tasi-yeh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dentity problems of politically radical British expatriates in France, who viewed themselves as “citizens of the world” while the concept of modern “citizenship” was being establish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main body of this article comprises seven parts: Parts one and part two focu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citizens of the world” and modern “citizenship.” Parts three and four respectively discuss the definition of modern citizenship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citizenship by British radicals. The new French regime translated abstract principles of citizenship into concrete prescriptions; that is, the French government created a documented citizenship with n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rights—while British radical expatriates in France still defined citizenship in the way it had been viewed in classical philosophy; that is to say, “citizens” implied good and virtuous people. As the French Republic went to war against the first coalition,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made extensive legislative proscriptions against foreigners and defined citizenship on political grounds. Parts five and six therefore explore the definition of “citizens” us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during the Terror and the

experiences of British radical expatriates in France. This reveals the problems the British expatriates fac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part seve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identity problem that British expatriates suffer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emmed from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 between their classical view of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and modern “citizenship” as defined concretely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They repeatedly mistakenly equated their “cosmopolitanism” with the French “fraternity.” Most importantly, this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current research on French modern citizenship tends to simplify the fluid and problematic issues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well as a complex cultural shift from the High Enlightenment to the rise of European states in the revolutionary age.

Keywords: Britain,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radicals, citizenship, citizens of the world